

# 巴山夜雨

抢救记忆 追寻真相 交流信息 积累资料

第五期 （交流文稿） 2011 年 3 月 10 日

## 目 录

【可用鼠标+“Ctrl”键点击篇名选择】

功臣怎样变成了罪人（林雪整理） .....	2
炮兵参谋尹显慧之死（牛立华） .....	8
我的右派档案（郭家一） .....	12
大饥荒岁月里的故事——“反右”轶事拾零（严家伟） .....	17
吴家场记事——我当生产队长的日子（陈仁德） .....	20
长忆写《秋风辞》的罗少云同学（青山） .....	30
忆“右派”难友、杂文家李石锋（曾国一） .....	35
重庆市大学生“右派言论”摘选（江畔愚公 辑录） .....	43

【关于《巴山夜雨》】友情交流的电子通讯，不定期，不定篇幅。无稿酬，也不收“版面费”。欢迎来这里“聊天”，把你们的往事琐忆、旧闻杂记、亲友追思、人生感悟等等写给我们，也可提供那些字行间回荡着历史风云的故纸残篇，如曾被视为“毒草”的昨日言论，曾被藏进箱底的日记书信，以及影响了个人和家庭命运的一纸判决书、平反改正通知书等等。赐稿请发至电子邮箱：[bsyy1957@qq.com](mailto:bsyy1957@qq.com)

# 功臣怎样变成了罪人

(节录自林向北长篇回忆录《往事难忘忆沧桑》，林雪整理)

按：林向北，原川东地下党员，中共执政后满腔热情投身建设，1957年时正在狮子滩水电站工程局任办公室主任，突遭“阳谋”暗算，从功臣变成罪人，打入另册二十年。从他的遭遇可以清楚地看出那场“运动”的荒谬与卑鄙。

狮子滩水电站工程基本完成，第一台机组已经开始发电后，水电部下达了狮子滩支援全国各水电建设的计划，局领导要我带队去云南刘朗洞水电站。我向局党委反映说，我不去刘朗洞，我要去学习。因为我入党以来快20年了，只在解放前进了五天的党训班，在三年的水电建设中，虽凭热情和干劲作了一些工作，积累了一些管理经验，但与时代的要求还很远，不学习，就要落后了。局党委同意了，说是等到重庆中级党校下期开学后，让我去学习。

我安心等候着，谁知风云突变，美梦幻灭了，等待我的是一场灾难。

## 风 云 突 变

1957年4月初，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起初我认为也不过跟往年一样，通过学习文件，利用批评和自我批评，下点毛毛雨，洗个温水澡，除去身上的灰尘，以便轻装上阵，思想上并不紧张。我当时是机关党支部书记，根据党委意见，要利用各种方法，创造一切条件，帮助党整风，特别是那些平时爱发牢骚，对党委、对领导不满的人，要尽量让他们把意见提出来，要组织鸣放委员会，负责运动组织、写大字报、整理材料等工作，成员中尽量不要有党员。我们支部的任务就是利用各种大小会议，创造一切机会。只启发、鼓励，不阻拦、不禁止，还动员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去市里参加会议，进行鸣放。

我把上面的话当了真，而这些民主人士又把我的话当了真，他们本着“长期共存，互助监督”的坦诚说出了蕴藏在心底的忠告，正盼望着进一步的共商国是，没想到一夜之间狂风暴雨从天而降，凡是被邀请帮助党整风的爱国民主人士，几乎都成了点名批判的对象，成了全国有名的大右派。此时的我还紧紧跟随着“大政方针”，上面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把工程局几个“不甘寂寞”的小青年发言稿翻出来，写成打油诗式的批判稿，用大字报贴在办公室的墙壁上，名曰“爬上墙的毒草”。打油诗写得很幽默也很辛辣，引来了川流不息的看客，有的摇头，有的点头，有的默默地走了过去，有的说我很风趣、有才学。党委的赵书记也夸奖我觉悟高、立场稳、爱憎分明、“政治嗅觉”灵敏，还号召党员和宣传部门的同志向我学习，我也洋洋得意，自认为是“反右”的组织者和积极分子。

我正在满面春风地带领一班人马充当反右急先锋的时候，工程局突然召开三级干部会，党委委员和支部书记、行政上的局长、工区主席、科长处长和工程队长统统要参加，不准请假，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揭发别人、检查自己——党内的“整风反右”运动开始了。很多人有些惊慌，但是我却心里很坦然，心想自己虽然在工作中有些缺点错误，却一直对党忠心耿耿，工作上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再得到各级领导的表扬和群众的好评，还是局里的先进生产者。再说解放后的运动也不是没有经历过，最后都是有惊无险，想来这次也“险”不到哪儿去。

没想到会议进行的第二天，针对我的大字报出来了，接着一天比一天多起来，小组讨论会对我的意见也不少。初先还算客气，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内容也不过工作上的一些鸡毛蒜皮。可很快就升温，各种花样都出来了，最后，竟按划分右派的六条标准，将我对号入座，有的断章取义，有的宰头去尾，有的张冠李戴，有的歪曲篡改，有的加盐加醋，有的生拉活扯，有的无中生有，有的造谣生事……真是稀奇古怪、无奇不有。

本来我就有骄傲自满的情绪，现在更加想不通了。老战友江伯言曾说过公道话：“解放前，老林

总是到最危险的新地方开辟新战场，待局势稳定后，他又去开辟第二个新战场，从不考虑名和利。”解放前后，无论在哪个岗位上，我也都是忘命的工作，特别是到了狮子滩，带着上千人的队伍保证了物资供应，为提前发电立了大功。如今不承认我有功、反而认为我有过甚至有罪，这不是活见鬼了吗？再说那些提意见的人，特别是那些表现得最积极、最“勇敢”的人，都是些平时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做，整天吃吃喝喝、装病、睡懒觉、不学习、不工作，像个马大哈，一问三不知。运动一来，精神有了，劲头足了，就把自己打扮成党的最忠实的捍卫者，发起言来又是鼻涕又是泪的，把自己打扮成最大的受害者，真是活灵活现的川剧中丑角。

这叫我怎么想得通！

## 我的“右派罪状”

到底用些什么“罪名”来定我为“右派”呢？我没有看到上报材料，根据在三级干部会上和大字报揭发的事实，大概有以下的几条：

首先是“独断专行，打击排斥党员老干部”。

当时供应处有一批由军队转业的老同志，大都是营以上干部，被分配在处内各个部门的领导岗位，由于年龄大、疾病多，领导一再打招呼，在工作上给以照顾，不能让他们过分劳累。对于他们的工作，我都本着这个原则尽力去安排，出于对他们的尊重，凡事也都要同他们商量，他们也都配合我的工作，大家相处得不错。可是一经“揭发”人之口，事情全变了：党委决定调一个老同志去杭州学习文化，由于他本人不愿意，就没有去，却说成我排斥老同志，要赶他出供应处；本来处内重大事项都是经过党政工团组织、支委会或每天的碰头会商量决定，并有记录可查，却硬说我独断专行，有事不同大家商量；本来是支委会决定不给某同志的困难补助，却说是我打击报复；我曾经说过“转业干部在新形式下，要努力学习业务，不要靠老本吃饭”的话，现在也认为是污蔑老干部，本来是党委和局领导有时因工作忙，叫我用党政工团的名义接待外来参观者，却说我好大喜功，爱出风头……甚至无中生有地“揭发”我说某同志是“木头人”（四川人兴说木老壳），我现在都敢拿性命担保：从未用过这个词汇。

第二条罪状，是我“立场不稳，重用旧人员，并企图把他们拉进党内”。

无论是在长期的地下斗争中，还是解放后在统战部工作，我都深深懂得党的统战工作重要性，何况在当时的供应处，懂得业务的几乎都是非党群众，有的是旧人员，有的是解放后毕业的大中学生，也有一些本地的工人和农民，他们为参加工业建设感到荣幸，在工作中积极负责，千方百计地去完成自己的工作，狮子滩工程能提前一年发电，在保证物资供应上，他们是立了大功的。我觉得虽然在思想上得加强对他们的培养教育，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则不能不依靠他们，诸如评选先进生产者、培训党的积极分子、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等方面，都应该要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给予照顾和考虑，这是我的职责和任务。可是没有想到在这次大揭发中，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意见都集中在这方面，还认为主要表现在负责采购、计划、设备三科非党负责干部身上。采购科指的是吴自如，他是1954年6月从二野政治部转业来的，是一位从小参加革命，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战斗英雄，早在1945年就入了党，后来由于“骄傲自满”，被“停止”了组织关系。狮子滩水电站开工后，他在供应处作采购科长，当时物资供应特别紧张，采购科是重中之重，他在战斗中受过伤，脚有点跛，却带领上百的采购人员，日夜不停奔走在全国各地，使各项物资源源不断运到工地，保证了工程需要。他文化不高，但苦钻业务、积极肯干，工作中，从不讲价钱，这样的干部我当然要重用，把他评选为先进生产者，作为积极分子培养，准备介绍他重新入党。计划科指的是曾缉光，重庆大学经济管理系毕业，是名副其实的专家内行，他担任计划科长，掌握着工程进度和物资计划，是整个物资工作的核心和灵魂。他不但在工作上认真负责，也积极靠拢党组织，要求进步，之前曾被上碚工程处党委列入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到我这里之后，将他介绍到党的积极分子训练班学习。还有设备科长陈杰，虽是旧人员，但业

务熟悉，工作细致，对设备的订购、组织进货和管理工作做得有条不紊，工作很出色……其他的一些非党的群众，和我一起挑起了供应工作的重担，成了物资工作的功臣。我对于他们理所当然应该关心、爱护和表扬，可是现在，这些都成了我的主要“罪证”。后来见得多了，才知道那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大都是些只会以“大老粗”为荣，到处骂人，不求上进的“共产党员”。他们自己不干工作，又不想看到别人工作出色，一旦别人干出了成绩，自己不追赶不学习，反而横加指责。他们不但攻击非党群众和干部，也攻击那些干出了成就的党员，攻击的言语之恶毒，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因为自己“对党感情深厚”，“仇恨阶级敌人”，为了表现这样的“感情”，不惜踩着别人的脊梁往上爬。可是在历次运动中，就这些人吃香。而像我们这样的人，干得越多越倒霉。

罪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我企图包庇“历史复杂人员”过关。而这个“复杂人员”，指的就是我的老战友贾希一，解放后他改名为陈昌，由重庆市政府介绍来狮子滩工程局作招待所长，工作一直都是勤勤恳恳的，只是因解放前长期在秘密战线工作，单线联系，组织关系一直没有接上。他曾写了多次申请，希望组织上调查了解，帮助弄清他的历史问题，但当时党委认为他的历史复杂，一时弄不清，也就没有理会。整风开始时，他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党委还是不理。有一次在去狮子滩的路上，他碰上赵某人，当面问赵为什么对他的申请不理。赵说：“你的历史复杂，有叛徒嫌疑，我们解决不了。”陈昌没想到他作为党委书记，竟这样信口雌黄，也气愤地说：“叛徒是你们加的，我是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当下两人就吵起来，引来周围的人围观，让赵某人下不了台。反右开始，陈昌就进入了“右派”的黑名单。招待所由办公室领导，我当时是办公室主任，陈昌在30年代就与我父亲、诗伯（注：指陈联诗，即传说中的“双枪老太婆”，作者的岳母，“诗伯”是作者对她的习惯称呼）和我相熟，不论从公情还是从私谊，我们常来常往都是很正常的，他每次来我家，大都是商量工作上的事，偶尔也谈一些往事，叙叙旧。即使这样，我作为支部书记，不应该说的还是不说，包括在鸣放初期，对陈昌也都没有谈过关于运动方面的情况。反右一开始，在我隔壁住的行政科长（以前是供应处的仓库主任）就在大会上揭发，说陈昌在运动中到我家去过五次，哪年哪月哪日，在我家去了多久，谈了些什么，都有盐有味、有根有据地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同这位行政科长虽然是邻居，但从来往。再说那个时候房子虽然不好，却很隔音，关着房门谁也听不清在说什么，再说当时还未听说有窃听器，他怎么可能了解得这样精细？可是有些人就是感兴趣，说我为陈昌通风报信，掩护陈昌过关，这也成了我的一大“罪状”。当然，最后是陈昌跑不脱，我也未能幸免，两个都戴上了右派的桂冠。

有了以上的这些“钢鞭”，积极分子们还嫌不过瘾，找来当右派要具备的“六条标准”一一对照，决心要把“花色品种”补充齐全，结果发现我的罪状中缺乏对“历次运动的态度”这一项，就想办法给加上。他们找到的例子，是“审干”中写“自传”的事情。1952年在统战部“整风”时，我就写了一个自传，后来“审干”又要写一个自传，当时工作特别忙，要坐下来花几天时间重写根本不可能，我只好利用出差回来在武汉到重庆的轮船上，赶写了一份自传交差。当时还表扬我“不顾辛劳”，现在却说我对“审干”不满，自传的事情一拖再拖，而且这次写的自传居然与过去“差不多”。看来这条“罪状”是有些牵强，还得编制一些才够得上分量。恰好运动末期，报上登了一条“揭发”，说是右派大头目罗隆基说过：“肃反”是残酷的。于是就照样画葫芦，一天忽然出现了一批大字报，内容是揭发我也说过“肃反是残酷的”这句话，有的说在路边听到的，有的说在食堂听到的，还有的说在车上听到的，至于到底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听到的，一概闭口不谈。到后来他们自知理屈，也就没有了后话，不了了之。还有人揭发我曾经接待过一位印尼的新闻记者，给他介绍了很多狮子滩电站的情况，本来这既是我的本职工作，也是一件好事，可是被那些个“积极分子”一发挥，就成了我“吹嘘自己，硬要外国记者写文章”，成了破坏国际友谊的一条“罪状”。

不过以上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都没什么分量，能够将我打成“右派”的“罪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组织了“以郭林为首的反党集团”。这是当时的党委书记赵某人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不，是他配合毛泽东“引蛇出洞”的伟大战略部署的具体行动，是毛泽东所说的那个“阳谋”。

那年的九月初，财务科副科长汤正模要出差，我是机关支部书记，按规定要为他向党委请假。我把事情告诉了赵某人，他说：“这是党内整风期间，提完了意见再走，不能欠账。”还叫我召开行政机关党员科长干部开会，他本人要参加，并要我通知郭林局长也参加。我通知了调度、财务、计划、人事等科的党员科长在会议室开会，郭局长到赵的办公室，准备同赵一起来开会，赵要郭先去，说他随后就到。人到齐后，赵还不见人影，我又多次去催，赵说：“你们先谈，我马上就来。”直到会议结束，赵某人都一直未到场。这时“鸣放”已经基本结束，转入了大张旗鼓的“反右”阶段，那些天真的人已经被花言巧语引出洞来，当成“毒蛇”打倒在地。面对这些前车之鉴，我们是心明眼亮，再说共产党员是党的忠实捍卫者，决不会做出任何有损党的形象和利益的言行。会议开得四平八稳，除了调度科长余寿山、财务科副科长汤正模就一些人事、工资和工程方面的事提了一些意见外，我同郭局长和其他两个同志都未发言，即使是后来赵某人他们精心篡改过的那份“会议记录”上看，也没有什么出格的言论。会议结束时我大松了口气，半开玩笑地对郭局长说：“还好，没有走火。”（即有没有过头的言语），郭局长也说：“就是，尽是鲜花，没有毒草。”

可是很快，这次会议就被说成是以“郭林为首的反党集团对党展开大肆攻击”的罪证，赵某人先是夸奖在会上发言的余寿山是“对党委负责的好同志”，一转眼那些话也成了攻击党、有个人野心的反党言论。可就是这些昧着良心整的黑材料，报上去之后还是批不下来，说是内容空洞，有些材料未落实，上不了线，要慎重。赵某人对此已经是呕心沥血，黔驴技穷，要是我们的“右派”帽子再戴不上，他不知道会落个什么下场，只好拉起大旗做虎皮，拿群众做幌子：“这些人民愤很大，再不批，我们无法说服群众啊。”

真是见了他妈的鬼了！

于是我们被重庆市委作为“优秀干部”调来支援狮子滩工程的五个科级干部，就有四个被划为右派反党分子。郭林局长也未幸免，只是因为他是中央部管的干部，水电部不同意对他的处分，所以他这个“反党分子”的帽子很快就被取消了。

## 为了孩子我得活

在这段时间，我思想斗争是激烈的，也是非常痛苦的。当时不断传来有人自杀的消息，我虽然曾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却从来都没有想到死。解放前在白色恐怖下，我随时都可能被敌人抓去坐监杀头，甚至每天外出都没有想到一定能回家，一直是置生死于度外，没把死当回事；再说诗伯在解放前不知死过多少次，解放后又受到那么多的不公平（注：指陈联诗遭到无理批判并被强迫退党），她都能坚持活下来，比起她来我有什么理由去寻短见？我父亲只活了46岁就走了，我的岳父也只活了32岁，我还有那么多的老战友英勇牺牲了，亲人和先烈的未尽志愿还要我去继续完成，我怎能去死？而最主要也是最现实的，我当时已是五个孩子的爸爸，孩子中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才两三岁，他们要活命、要读书，宁君每月只有50元工资，我要是死了，她怎么养得活这一大群孩子。

我相信只要活着，总有一天党会还我清白的，死了就会背一辈子黑锅，连子孙也不得安宁。我必须活着，就是忍辱含泪也要活着。

中国人常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可是当时的环境不由得你“不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性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个曾经骄傲的、自信的、灵巧的、朝气蓬勃的我不见了，只剩下一个看起来萎缩不堪的“右派分子”。原先容不得别人提点意见的我，已经不在乎有人往脸上泼污水。他愿意泼就泼吧，一次、两次、三次，直到当他手软嘴干不耐烦为止：我反正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其次是大帽子下面开小差，自己拿自己无限上纲上线，把鸡毛蒜皮的小事说成“三反”行为。有些人高兴了，认为战果辉煌，其实那都是一些无根据的空话，顶屁用，是好是坏是真是假，群众清楚自己明白，并不是哪个人说了算，那些没有事实根据的东西，到后来还不是得一风吹！对一些无中生有，污蔑不实之词，我采取软抗、沉默和不抵抗态度，不能处处针锋相对，当面顶撞，只要不是原则问题，顺着他们

说说也无妨，否则会被认为是顽固不化态度恶劣，这在以后结案处理时是要吃大亏的，这就是古人说的“好汉不吃眼前亏”。但是对一些原则问题，也不能乱说，在书面检查时把事情说清楚，不能让人抓辫子。按照这个原则，我写了三次书面检讨，前两次都未通过，第三次要我按“划分右派的六条标准”对照来写，我知道这场祸事躲不了，所谓“顽固到底，死路一条”，你一个字不写，一件事也不承认，他也可以定你为右派。于是我一夜写了一万多字的书面检讨，尽量拿“大帽子”往自己头上扣，心想只要以后再不找我的麻烦就行。

宣判终于等来了：我戴上了“右派”帽子，而且不出我所料，事情从此平静下来。我大大松了一口气：我活出来了，孩子有救了。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战争中，我没有许云峰和江姐那样为了自己的理想“视死如归”——因为我面对的不是蒋介石和徐鹏飞，而是上级党组织和所谓的“同志”。我也没有马寅初、梁漱溟那样威武不屈、敢做敢为——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只能作驯服工具，只能有愚忠愚孝。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我。直到今天，我也既不求人理解，也不求人原谅。是是非非，让历史作证，让后人评说。

## 等待宣判的日子里

狮子滩工程完工了，我们的问题还没有最后作结论，就到干部下放队参加拆工棚、收拣废旧料等一些结尾工作，下放队都是些年轻人，也在等待分配新的工作。前一段时间，我被时时斗、天天斗，斗得来晕头转向，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满脑子都是想不通想不通。现在再也听不到那些假言假语的劝说和虚张声势的恫吓，再也看不到那些人面兽心的混蛋和狐假虎威的奴才，重新来到这片曾经日夜战斗过的天地，同小伙子们说说笑笑的，真有一种解放自由的感觉，心情居然也舒畅起来。工棚都是用楠竹做梁架，盖上稻草搭成的，这些材料当初都是我们去四乡收购，由农民送来的。我触景生情，不觉又回忆起那些难忘的人和事，如今它们完成了历史使命，我们也都成了废物处理品。下放干部中不少是供应部门调去的，大家纷纷为我报不平，说了不少发牢骚的怪话，我强作笑脸劝他们说话要小心，谨防遭狗咬，发牢骚是要吃亏的。也在这个时候，我学会了抽烟、喝酒，跟他们打得火热，劳动时他们总是让我干轻活，自己挑重的。此情此景，让人感觉到特别的温暖，在这样的温暖中，我那机灵劲重新降临，又开始不甘寂寞起来。开始拆除一间200平米工棚，起码要花费一两天的时间，我很快发明了“快速拆房法”，只要20分钟就行，而且简单可行：四个人爬上屋的四角，先将捆绑的竹丝砍断，然后用绳子一拉，整个草房就原地倒下，然后再分别清理。这样一来，半月的任务，几天就完成，小伙子们跟我开玩笑：“你戴罪立功，可以减刑。”我自己则说：“我是功上加功，应该传令嘉奖。”

那个时候有谁想到，我将变成一个人不人鬼不鬼，含冤20年的“右派”。

一天我们正在拆俱乐部的工棚，诗伯突然出现了。她身穿一套灰色的列宁装，笑着向我招手。我扑过去握着她的手，喊了一声诗伯，眼泪就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这是我解放后的第一次流泪。

诗伯抚摸着我的头发，笑着说：“我给你带了一罐你喜欢吃的忠县豆腐乳。”又打开一幅带来的竹帘，画的是观音菩萨坐在莲花座上，右上角题写了“忘掉过去，笑谈人生”八个字，不用解释，这是她对我目前处境的安慰。诗伯对我说：“宁君在党校学习，想回来看你，又不好请假，她叫我转告你，她很好，不要担心她，不管情况怎样变，她一定会同你患难与共，永不变心。”诗伯最后留下了一句话：“你不要难过，我受的委屈比你多。我们都要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红是白终会水落石出。”

这次会面只有半个钟头，却让我终身难忘。

1958年3月7日，是我最难忘也是最伤心的日子。那一天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考察三峡后，顺道来长寿看看新中国成立之后由我们自己修建的第一个水电站——狮子滩水电站。要是在半年前，接待他们的任务理所当然是我来承担，可是今天，我不但被剥夺了这个权利，就

连见见他们，跟他们握手问好的机会都没有。远远望着那些沸腾的人群，我的心里感慨万千。当年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是周总理为首的南方局领导我们在敌人的心脏里进行战斗。宁君在他亲自关怀和领导下的孩子剧团生活战斗了三年，多次聆听过他的教诲，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但他在红岩、在曾家岩、在敌人的谈判桌上的一举一动，都成了鼓舞我们舍生忘死的动力。

那天闻讯赶来见总理的工人和干部潮水一般，把俱乐部围了个水泄不通，可是他们中有几个能有我与总理这样深厚的情感，更何况接待他原本是我的职责，是我的任务啊！我只想跑向前去大叫一声：“敬爱的周总理呀！我冤枉呀！你要为我申冤啊！”可是最后终于没有去犯这个傻。何必呢？那不是罪上加罪吗？

世界真有这样凑巧的事，我没见到周总理的遗憾，居然被我的宝贝女儿弥补了。女儿抗美当时刚满六岁，长得很乖巧、活泼可爱，整天跟着她妈妈屁股转，嘴巴甜，叔叔们都爱抱着她四处转。人虽小、不谄生，也算见多识广。那天，总理来了，大家都拍掌欢迎，她从人群中钻进去，跑到总理前面，叫了一声爷爷，总理笑着拉着她的手，问她“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抗美。”女儿嘟着嘴巴说。

总理把她抱起来说：“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多美呀，为什么要抗美。”

“妈妈说的，以后长大了要打美国鬼子。”

总理连声说：“好，好。”他笑了，陪同的领导都笑了。

周总理走了，很多人把抗美抱起来，说她今天很幸福，抗美笑嘻嘻地跑回家来诉说当时的情景，一些好友也来向我报告这一喜讯，我抱着抗美亲亲她，含着泪说：“乖乖，我的好女儿，你替爸爸出气了。”宁君却叹了口气，说可惜没有留下照片，在场几个照相的人都说手里没胶卷了。想来都是因为我当时的“特殊身份”，谁也不敢犯这个忌讳。

现在回想起来，自己挨了整，却也曾做过两件使别人挨整的糊涂事——只是当时并不觉得。

在“党内整风”后期，我的问题升温了，郭林的问题也提出了，在追问我与郭林的关系时，我觉得我们之间既没有阴谋诡计，也没有反党言行，再说实事求是反映问题，也是一个党员对于组织最起码的忠诚。于是我就一五一十地将平时我们之间的一些交往谈了出来。谁知赵某人一听，如获至宝，从中断章取义、生拉活扯，编造出一大堆所谓“郭林反党集团”的罪证，我才知道上当受骗了。虽然这些言行现在横看竖看都找不出什么“错”，但在那个年代，就是没事也会给你找出一大堆事来，更不用说这是你自己亲口“坦白交代”的真凭实据，结果是再明白不过了：既害了郭林、也害了我自己。几十年来，我一直为此事心中不安，直到2002年才鼓起勇气，很诚恳地给尚还健在的郭林写了一封赔礼道歉的信。直到收到他谅解的回信，我才卸下了背了几十的沉重包袱。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批判胡风。1955年全国展开了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组织上知道我在解放初与胡风一道参加巴县土改，要我揭发胡风在土改中的“罪行”。这个运动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来势凶猛，再说我对胡风的当时表现也有一些看法，于是很乐意地接受了任务，在很短的时间内写成了一篇“胡风在土改中”的揭发文章，随后又在工程局召开的批判胡风的大会上，作了专题发言。虽然说的写的都是胡风在生活上的鸡毛蒜皮，和他对土改中具体作法的一些意见，但有关部门当作宝贝，马上在全国主要报纸和刊物上登载，每隔十天半月就有报刊给我寄来多少不等的稿费，让我名利双收，我也兴致勃勃，把稿费用来请客打牙祭。按照常规，只要把这件事情“换个角度”，就成了“右派言行”的一条钢鞭，可是赵某人自始至终没敢提它，原因是当时赵某人正好与我一起参加土改，他还是巴县的县委书记，我和胡风闹别扭的时候，他同区委都一边倒，批评我没有与胡风“搞好团结”，“影响了统战关系”。后来有人知道了真相，怪我在这件事情上心慈手软，要不然反咬他一口，到头来“右派”到底是谁，还说不准呢。

话又说回来，当时对报刊上揭发批判胡风的文章，因为是毛主席亲自挂帅的，我一直都深信不疑。后来鉴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此事也有些半信半疑，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风问题的真相被揭露

出来，才知道自己又一次上当受骗，曾多次想给胡风写一封道歉的信，都没有勇气，直到他逝世，这笔良心账还没有还。

## “虎落平阳”之后

1958年的6月，一场“思想战线上的伟大战斗”胜利结束了。没有敲锣打鼓的庆祝，也没有热热闹闹的欢呼，更没有标语口号，连那些伟大的胜利者都没有出场，只是在一个冷清的小屋里，由一个小人物宣布给我们几个人戴上了“右派”、“反党”的桂冠，不到五分钟就草草收场。桀骜不驯的余寿山由于死不认罪，只给每月生活费40元，连他的爱人也被一起划成了“右派”。我虽然戴上了“右派”桂冠，可是由于最后的那次检查“深刻”，认罪态度较好，落得个“从轻发落”：按照有关规定，行政级别连降三级，由原来的14级降到了17级。可是在讨论我的处分时，住在我隔壁的那位行政科长又站起来“义愤填膺”地说：“不行，他两口子的钱够用了，要降到19级。”于是我的级别由14级降到了19级，实际上降了5级工资，每月工资74元。那位老兄由于整我有功，后来被调到某个单位作供应处长，可是好运不长，不久他因为吸毒成瘾，不治而死。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罪有应得。狮子滩水电站到底制造了多少右派，我不知道确切数字，但据知情者说，当时划为右派、反党分子、地主、坏分子、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分子，特嫌、暗挂右派……等属于敌我矛盾的，就有500多人。奇怪的是党委系统没有一个右派，怪不得有人在批判我时说，党委系统很纯洁，没有右派，而坏人、右派都出在你们行政系统。没想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年以后又开始了“反右倾”运动，当时以“胜利者”自居的赵大人，居然也坐到了被告席上接受批判。他在检讨时痛哭流涕，承认自己名利思想很严重，为了想当局长，千方百计整倒了郭林和一批得力的中层干部，伤害了一些好同志……事情至此真相大白。

几十年过去了。今日我们平心静气地来分析那场气势汹汹的“运动”，显然不是个人的力量能够抵制得了的。但是如果不是那些趁机想为自己狠捞一把的人在其中推波助澜，也不会形成那么大的声势，造成那么大的伤害。

宣判后不久，我们随队转移川西平原的灌县紫坪铺工地，离开了狮子滩。回想三年多前，我们由重庆来到此地，马路两旁站满欢迎的人群；如今我们在押送下走向码头，路旁一些下班工人和家属默默地看着我们，谁也不说话。整整三年，新中国水电这块美丽的园地上，第一朵鲜花开放了，花儿虽小，却是那样的鲜艳迷人。可是我们这些在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精心守护、培育鲜花的辛勤园丁，一个个都成了罪人，苍天有眼，公理何在！

这一年，我39岁。■

## 炮兵参谋尹显慧之死

牛立华

**按：**本文作者牛立华，在重庆兵工企业长江电工厂任技术员时被打成右派，从1958年到1966年先后在重庆新建机械厂、成都劳改局加工厂、成都通惠汽车修配厂、四川磨床厂、四川消防机械厂戴着右派帽子劳动教养、摘掉帽子后又强制留在劳教单位就业，文革中1966年11月6日被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押送四川省十大监狱之一、位于川西芦山县境的苗溪茶场（川西监狱）劳改服刑。直到1979年才获得平反。本篇摘自他正在撰写的长篇回忆录。

1968年春，苗溪茶场第十三中队又增加了十几个新犯人，分别安插在几个工区。



照例，带队的干部向在押犯人交代，要加强对新犯人的监督，不准他们脱离集体单独行动，发现异常要随时向干部报告，还特别指定几个老犯人一对一地密切监视新犯人的一言一行。我那时到劳改队也不过一年多，属于半新不旧之类，既要接受监督新犯人的指令，又必然在老犯人的监督之下。

过了不到一个月，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大约五点多钟，上面传来了命令，全体犯人带小凳在院坝里集合。一阵忙乱，各人拿各人的坐具，有的是一块小木板，有的是自己钉的小板凳，有的是一条腿的独凳，形状各异，高矮不等。言论、出版没有自由，坐在屁股底下的东西还真体现了伟大领袖倡导的百花齐放。

中队指导员周金仁先行开场，都是日常讲的那些话，要认罪，要接受改造等等，然后喊上来一个新犯人，让他讲“低头认罪、接受改造”。新犯人给老犯人现身说法，我觉得很新鲜，真要好好听听。

因为我一直没有认罪，也找不到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不认罪却被判了重刑，是一件很矛盾、很痛苦的事。如果能够得到一点启发，能让我认罪，岂不是天大的好事嘛，所以我安心领教，做了洗耳恭听的思想准备。

上来的这个人就叫尹显慧，五短身材，貌不出众，口齿清楚，条理分明。看来是做了一番准备的，讲话稿也是经过审核的。细细地听，也就是把个人臭骂一顿，对伟大的党赞扬一番。企图歌功颂德，却又言之无物，一味曲意逢迎，难免言不由衷。讲了半个小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当时我就产生了一点鄙视他的感觉，坐在我旁边的难友大概也有和我同样的感受，悄悄地说了一声“屁眼虫”，透露出看不起这种人的情绪。

尹显慧在一工区，劳动地点在万家山，主管狱警是田加伦。我在三工区，劳动地点在付家坪，主管狱警是徐绍华。照劳改队定下的规矩，即使同一个工区的犯人也不准交头接耳，互通案情，各工区之间的犯人更不准彼此串通，相互来往。各在各的监舍，各在各的工地。犯人当中也有不少“特务”，发现谁和谁串了工区，谁和谁说了话，都有人向管教干部汇报，这种人即属于“屁眼虫”一类。我和尹显慧不在一个工区，素无来往，即使面对面走过，也没有说过话，顶多用藐视的眼光瞥他一眼。春末夏初，是栽插红苕（甘薯，不同地区又称白薯，红薯、番薯、山芋、地瓜；四五月份栽插藤蔓，九、十月份收获块根）的季节。一天收工过后，从一工区传来了尹显慧逃跑的消息。

栽插红苕的时候，一部分人整土地，用锄头在地里垒出一条条高宽一尺有余的埂子，按规定一个人一天必须完成三分地的任务，干这个活儿的从早到晚不敢懈怠。少数人在红苕苗圃里剪红苕藤，并负责运到地边。然后工地上的犯人一起动手把四五寸长的藤蔓栽插到土埂子当中。剪红苕藤的任务一般派老弱犯人去干，新犯人有逃跑的危险，不允许从事离开众人监视的单独劳动。由于尹显慧进劳改队不久即现身说法，大讲认罪，卑躬屈膝，接受改造，众人信以为真，以致放松了对他的监视。

据说那天他光着上身，只穿了一条短裤，上午剪了两背篋（竹子或藤条编的背在背上运送东西的用具，四川农村使用竹背篋非常普遍）红苕藤，下午接着干，在地里干活的犯人等了半天不见有人背红苕藤过来，这才慌忙去找，哪知踪迹全无，不知道什么时候尹显慧逃之夭夭了，连背篋也没有留下。赶快报告劳改队干部，他们也慌了手脚，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安排追捕。霎时间，摩托隆隆，分几路出动，然而忙了半天不见效果。

监狱内犯人逃跑是常发生的事，我所在的劳改队每年都有数起，然而绝大多数是跑不出去的。那时对于“人民”的管制尚且十分严密，有严谨慎密的户口制度，有几十种票证的约束，走到哪里都需要粮票和各种票证，否则连饭都吃不成。无论到什么单位都需要介绍信，否则进不了大门，大大小小的旅店、宾馆都属于特种行业，没有介绍信休想入住。对犯人来说，逃跑自然有更多的风险。我不主张逃跑，而且还劝说过个别有外逃想法的难友，提醒他们现在是高度集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庞大的公安系统，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有技术含量高的通讯设备，个人本事再大也难以对付如此众多的

专政机器。这次尹显慧逃跑，我真替他担心。

那时候还不知道尹显慧是以什么罪名被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的，但是知道了他认罪是假，意在寻机逃跑是真，口头上认罪仅仅是韬晦之计，是麻痹干部的手段，不过采取的方法的确有损人格，难于恭维。

随后我被关入小监，1969年5月我从小监里活着出来，不久，尹显慧被押送回来，关在我曾经住过的那个小监隔壁了。

尹显慧抓回来了，劳改队的干部兴高采烈，兴奋之余，难免口无遮拦，透露了一些尹显慧的情况。原来他是兰州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原籍四川省新繁县，家庭出身良好，毕业后服从分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炮兵部队担任参谋，副团级，共产党员。三年困难时期天府之国也难免受难，尹显慧认为造成困难局面的原因并不是中共中央再三宣传的“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川西平原得李冰父子两千多年前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之泽惠，自流灌溉、旱涝保收，本无灾害之虞，那几年却也在饥饿中挣扎，甚至饿死许多人。他认为当时的中共中央尤其是毛泽东犯了严重的错误，于是企图改组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为此上书中央，让毛泽东悬崖勒马、改弦更张。一片重振共产主义的好心却成了攻击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罪名。

在那个时代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要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尹显慧能够在炮兵部队担任参谋之职，必然是“根红苗正”。党章虽然规定党员可以向上级直至中央申述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但那只是文字游戏，和宪法一样，绝对不能信以为真。尹显慧却天真地把那些写在纸上的东西当作了金科玉律，上了当。

一个小小的炮兵参谋竟敢如此大胆，即便是出于忧国忧民，出于捍卫共产主义，出于为了维护共产党的政权、巩固共产党的统治，但是批评了毛泽东，岂不是在太岁头上动土？

1969年初秋，尹显慧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苗溪茶场第一次枪毙人，不免要隆重一番。先把尹显慧从小监里放出来，给他剪去长了几个月的头发，换了一套蓝布劳改服，然后关押在一个冬季用于储存红苕的地窖里。这个地窖在一条小路旁边的竹林下面，平时犯人出工可以路过，尹显慧进去了，这个路段就戒严了。俨然是首长驾临的待遇、一级警卫，地窖外面除了持枪的武警昼夜二十四小时值班以外，还派了两个犯人把守洞口，兼任送水、送饭、倒马桶。饮食上有特殊照顾，即不再吃犯人的伙食，享受劳改队干部待遇，一日三餐有鱼有肉。以后苗溪茶场还枪毙过潘启云[1]，郑远惠（女）[2]、张家凤（女）[3]等人，都没有受此殊荣了。

十天以后，在苗溪茶场第十三中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执行大会。除了十三中队全体犯人大约三百名以外，其他各队也派出了代表，将近两千人密密麻麻地坐在这个坝子里。会场前面用竹竿和木板搭建了一个临时的舞台，灰色的天幕，侧幕和耳幕都是劳改服的蓝色，舞台上悬着白底黑字大横幅，一律的冷色，颇显苍凉、悲切。苗溪茶场的场长姜同海[4]，书记董霞云等坐在上面。

十三中队平时常驻一个警卫班，那天至少来了一个排，会场周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附近的高处还驾着机关枪，如临大敌，大概担心有人劫法场。

大会开始，宣读罪状，无非是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攻击伟大领袖，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罪大恶极等等，结尾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跟着，八九个武警蜂拥而上，其中两个一左一右架着五花大绑的尹显慧离开会场。苗溪茶场的头子姜同海在台上声嘶力竭地宣扬无产阶级专政，坐在地上的两千在押犯人和就业人员默不作声。大约半小以后，就在离会场不到二十米的公路上，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一声，再一声。三声沉闷的枪响，又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去了。

这时候十三中队的的一个姓贺的干部走到本队犯人队伍的跟前，高声喊着：“胡世富、牛立华、黎正信、龙兆云……”一共点了十个人，我们跟着他走出来，离开会场才知道是让我们处理尹显慧的尸体，这相当于陪杀场或者说是企图用死人来吓唬活人，亏他们想得出来！这十个人大概是劳改中队指导员周金仁等人心目中的反改造分子，是精心挑选出来的。

对犯人来说，劳改队干部的话就是命令，相当于最高指示，不得违抗，只有硬着头皮服从。我们几个到工具房拿上锄头、铁锹往杀场走去。贺干事又下令：“你们六个去挖坑，你们四个抬人。”我在抬人之列，龙兆云悄悄跟我说：“快点！”我莫名其妙，他又说：“走前头，抓脚。”我明白了，走后头必然是要抓着尹显慧的手，看着被打烂的脑袋，惨。

不到三分钟，我们就到了杀人现场，尹显慧的尸体头西脚东顺着公路安详地躺着，旁边有八个持枪的武警守灵。我和龙兆云快步上前，一人提一只脚。尸体还是软的，脚还是温热的，另两位难友则一人抓住尹显慧一只手。公路北边就是山，山坡上有一片小柏树林。那六个人直接上山挖坑去了，我们四个提着尹显慧的尸体一步一步地往山上爬，终于到了预定的地点。

将近六十岁的丁司务长（劳改队的干部，管理犯人的伙食等事务）在山坡上指挥挖坑，老头儿连说了几遍“挖深点，挖深点”。隔一会儿又说：挖深点，挖深点。老头儿心眼儿好，怕山上有野狗骚扰尹显慧。那个贺干事也是农民出身，肥头大耳膀阔腰圆，平时看不出来有什么刁钻古怪，那天却异常活跃，一会儿喊黎正信过来给尹显慧系一系衣服上的扣子，一会儿喊我给尹显慧把鞋穿周正，他用尽心机让我们几个多接触尹显慧的尸体，意在给我们留下更深的印象，多吓唬吓唬。他不懂，人到了这个地步，心是横了的，我们十个人没有一个害怕，只有对法西斯的愤恨和厌恶。为了反击这个姓贺的走卒，我们一句一对地说起了笑话，胡世富说在坟包上种一窝南瓜，肯定长得又大又好吃；黎正信说种一棵苹果树，结的苹果必然鲜红鲜红的，又脆又香；跟着大家一阵哈哈大笑。我突然意识到悲和喜在某些时候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悲痛至极可能狂笑，快乐至极可能流泪。经过这一搅合，那位酷似猪八戒的贺干事在山坡上来回地转悠，低着头，一句话不说了。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坑挖好了，真的不浅，至少有一米。我们把尹显慧的尸体轻轻地头朝北脚朝南安放在墓坑之中，一锹又一锹用刚挖出来的新鲜土掩埋了，是无需棺材的软埋，让尹显慧的身体直接挨着他深爱的祖国大地。

这座山叫万家山，朝南的山坡上只有这一个孤坟。

当天晚上，按惯例学习，三工区的主管干事徐绍华洋洋得意地组织犯人座谈枪毙尹显慧的心得体会。他是跟着刽子手一块儿到杀人现场的，谈话中间他说尹显慧反动透顶、顽固不化，直到要被枪毙的一瞬间还喊口号。我们才知道尹显慧为了他理想中的共产主义信念临危不惧、坚贞不屈。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真正忠于共产主义信仰的战士、真正的共产党员。后来听说尹显慧临刑前曾被押上大卡车到芦山县城示众。那天街头拥挤着看热闹的男男女女，尹被五花大绑，由两名狱警挟持着，高昂着不屈的头颅，双目圆睁，毫无惧色，视死如归，从容就义，多年后仍传为佳话。

1984年，曾经在苗溪茶场十三队坐过牢，平反后在四川省委工作的王地山在雅安寻访当年苗溪茶场十三队一工区主管干事田加伦时，回忆起尹显慧临终的情景。田加伦说：尹显慧的最后一夜由他负责看守，两个人都没有睡意，谈了一整夜。尹对他说：“我们都曾是军人，我以军人的诚实和直率谈谈自己的遗言。极‘左’势力在中国统治得太久了，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但它不会永远统治下去，镇压人民的人必然会遭到历史的唾弃。天快亮了！我虽看不到那一天，你一定会看到的，应该清醒地看到时代的走向。”

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在共产党的监狱里上杀场之前说的话，是那么从容，那么镇定，临死还忧虑着国家的前途，还期冀着黎明的曙光。

尹显慧牺牲四十年了，不知道他家里还有什么人，有没有为他申诉，其后有没有平反。

尹显慧大约是1937年生的，如果活着今年该是七十三岁了。

附注：

[1]潘启云，1937年参加共产党，1949年随晋绥部队入川。文化不高，任重庆市商业部门副局长。六十年

代，自持资格老，敢于辱骂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旋被判处有期徒刑，先后在四川简阳平泉农场、芦山苗溪茶场劳改。1970年以攻击伟大领袖罪判处死刑，在苗溪茶场执行枪决。

[2]郑远惠（女），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1970年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污蔑伟大领袖之罪，在苗溪茶场被执行死刑，时年不过三十岁。

[3]张家凤（女），六十年代军事院校毕业，容貌姣好，多才多艺。在某部队工作期间被有妻室儿女之“中国人民解放军”首长奸污，导致精神分裂症，不时辱骂该首长，旋即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平泉农场、苗溪茶场等地劳改。服刑期间精神分裂症日益严重，继续辱骂管教干部等人，1970年9月30日以污蔑伟大领袖罪被执行死刑。

[4]姜同海，苗溪茶场场长，也就是监狱长。平时威风凛凛，道貌岸然，善言辞，说话有条理，也有一定的文化和理论水平。在等级森严的体制下，监狱干警见了他都是点头哈腰、毕恭毕敬。实际上，这个深受共产党重用的监狱长品质恶劣、道德败坏，是个十足的衣冠禽兽。他多次利用职权奸污多个年轻的女犯，不仅贪女色，还好男风，1971年因鸡奸军犯败露，勒令反省期间上吊自杀。■

## 我的右派档案

郭家一

**按：**雨果说过，比大地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宽广的是人的思想。日记，是个人思想的记录，以日记定罪，等于以思想定罪，这是比以言论定罪更加荒唐的事，为任何文明国家、文明人群所不齿，然而这样的事在那逝去的“红色年代”里却成为常态。定罪者理直气壮，获罪者诚恐诚惶（甚至在后来为自己申诉时也得承认自己有错误思想）。如今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当年的言论、思想被钳制和禁锢到了怎样的地步。感谢《山西文学》的编者能把这样的非文学类史料刊发出来，留下历史的见证，使后人们得以了解那个“**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真相。应作者要求，本刊现予以转载，以供更多的读者了解并引起对那样的“红色年代”以种种手段借尸还魂的警惕。

**【《山西文学》编者按】**山西作家郭宇一先生转来他哥哥郭家一先生的信和五件资料，有的是公检法的判决书，有的是个人申诉，有的是学校的改正决定。看了这些资料，也不必怎样的悲伤，怎样的气愤，只要知道，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确曾有过那样一个时期，确曾有那么个善良而有作为的人，受到了那样不公正的对待。他肯定不是你，也不是你的家人，但，他肯定也像你一样的善良而且想有所作为。本刊发表这样的文章，不是为了怨往昔，而是为了鉴未来。无论我们的社会怎样发展，都不要再演曾演过的这一幕。不是说这一幕多么悲惨，而是说“再演”太缺少智慧。从这一点上说，所有人的看法都是一致的。顺便说一下，郭宇一先生曾写过一篇《家国同荣辱或一家四右派》，刊本刊2005年第3期，想对郭家一先生身世有进一步了解者可参看。郭先生的资料无总题，此总题是本刊拟的。

### 郭家一先生给本刊的信

《山西文学》编辑先生：

我叫郭家一，系山西忻州师专退休教师。

我1957年在北大读书时被错划为右派。1960年毕业后分配到保德中学任教。1966年“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搜出日记被捕。1970年被保德县公检法军管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此后在省第一监狱服刑。1979年北京大学党委为我的右派问题平反，之后我多次向保德县人民法院、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终于在1979年改判为无罪释放。

这十三年的牢狱生活是我一生最大的灾难。那是刻骨铭心没齿难忘的。而造成这冤案的历史大背景和那个时代，也应该是每个中国人刻骨铭心永志不忘的。我看到贵刊刊登的一些以个人档案组织而成的文章后，受到了一些启发和启示，遂萌生了将我个人所经历的这一切劫难反映出来的想法。我绝非在咀嚼苦难，恰恰相反，那段经历我常常是不忍回首的。历史是无数细节构成的，我只是想提供一些个人经历的真实细节和资料。我想或许对后人和历史学家研究认识那段历史有些参考价值，倘能如此，便心满意足了。

原想将自己这一段经历记述下来，后来觉得何不将当时的有关材料和盘托出，岂不更具原汁原味？于是便冒昧地将我当时的判决书、申诉材料、北大的右派改正通知以及保德县人民法院平反判决原件奉上。我想如果读者有兴趣，只看这五个材料就对我受难的全过程有个清晰的了解了，毋须我再赘言。

我深知这些材料不具有任何文学价值，如不合刊用，耽误编辑们宝贵的时间，我表示抱歉。如果你们觉得尚可，是否定名为《55 万分之一档案实录》，副题为：我的判决和申诉。

稿件全系原始材料复印件，按时间编号为①至⑤，铅笔注明。

顺致

敬意！

郭家一

2005 年 9 月 24 日

## ①保德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的判决书

### 最高指示

**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保德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刑事判决**

(70) 保军刑判字第 3 号

现行反革命分子郭家一，男，现年三十四岁，汉族，文化程度大学，地主出身，本人成份学生，右派分子，系山西省宁武县头马营村人，捕前系保德县中学教员。

郭犯从一九四二年起，先后随父在太原、北京、东北等地住学，一九五五年考入北京大学，并在住学期间混入我共青团组织。其父系历史反革命分子，国民党员，曾任过日伪县长，伪七十兵工厂付[副]工程师，现群众管制，兄、姐均系右派分子。由于其反动家庭出身，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一九五七年北大反右派斗争中，因猖狂向党进攻，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团籍，继续留校。一九六〇年毕业后，分配保德中学任教，只给生活费，群众监督改造。但郭犯毫无悔改之心，竟变本加厉，拒绝改造，即在保中任教期间，歪曲党的教育方针，蓄意散布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毒素，腐蚀毒害青年学生，讽刺打击贫下中农学生和教职员工，作风败坏，乱搞男女关系。更严重的是从一九六三年以来，书写反动日记近二十本，内容极端反动，除寄放其姐姐家中八本，投入黄河两本，焚毁一部外，于一九六六年九月间，郭犯乘放假之机，将其反动日记试图带走销毁罪证。被红卫兵发觉搜出（16 开纸）八本，以及零星反动日记。

郭犯日记里，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恶毒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攻击诬蔑社会主义制度三面红旗。并及[极]力反对突出政治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疯狂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而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右派分子喊冤叫屈，极力辩护，与帝、修、反遥相呼应。明目张胆，反革命气焰嚣张，确系死心踏[塌]地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行严重，民愤极大，经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

准，故依法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郭家一无期徒刑。

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保德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章）

一九七〇年

三月八日

## ②郭家一先生给保德县法院的信

保德县人民法院：

我从六〇年至六六年曾在你县中学任教。六六年九月，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造反搜出我的日记后，被扭送公安局拘留，同年十月二十日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七〇年三月“一打三反”开始后，被保德县公检法军管组判处无期徒刑（〈70〉保军刑判字第3号判决）。送省一监服刑。

在我被关押和判刑后一段时间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被剥夺了任何申诉的权利，因此现在虽然事隔十二年之久，我向贵院提出如下申诉，请予审理。

〈一〉判决说“即在保中任教期间，歪曲党的教育方针，蓄意散布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毒素，腐蚀青年学生，讽刺打击贫下中农学生和教职员工……”

这不是事实。我是因在大学读书时被定为右派而到保德中学群众监督改造的。因此我当时在政治和生活各个方面受群众监督，在经济上我仅能领到最低的生活费用，在工作上我则担任最重的教学任务。我既不是学校领导又不担任其它诸如班主任之类的任何职务，我在保中仅做为传授科学知识的工具而存在，我有什么条件和能力去歪曲党的教育方针呢？假如我真有其意，也仅能是一种痴心妄想。我除了教学工作之外，和学生教工无任何接触，我教的是自然科学——数学和物理，每天都是X、Y，定理、定律、实验，怎么能从国家审定的教材中和我的讲授中找到封资修毒素呢？如果像“四人帮”那样把自然科学知识都统称为封资修毒素的话，那的确我是蓄意散布了很多，这一点被我教过的学生都可以作证。我在保中手中无半分权利，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对我的一言一行提出异议，并且我也便只能是俯首是听，连起码申辩的权力都没有，如此我用什么资本和手段去腐蚀青年，去打击贫下中农师生呢？一个戴帽子被群众监督改造的人，居然能腐蚀和打击别人，何以令人置信呢？让保中领导、教工和学生能举出一件我腐蚀和打击他们的真实事例吗？

〈二〉判决说“郭犯在日记里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污蔑社会主义制度、三面红旗，并极力反对突出政治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疯狂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而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右派分子喊冤叫屈，极力辩护，与帝修反遥相呼应……”

事实是：我的日记是六三年至六五年书写的，其内容绝大部分是个人的生活琐事，以及阅读书报的心得和摘抄的笔记等。指控我的所谓恶毒攻击污蔑言词，是我一些原始思想和认识的记载，以及个人情感的自我流露。涉及内容，主要是我感到像我这样解放时才十二三岁的孩子，五七年鸣放时也仅不过二十岁，而又是一直读书的青年学生，和资产阶级政客和反动资本家有本质不同。所以尽管在大鸣大放时由于种种原因说过一些错误的话，但也绝不是想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所以在即使被定为右派之后，并没有丧失争取的信心。我努力工作，但是一年一年过去了，右派帽子都一直没有给摘掉，因此也就一直处于群众监督之下。我当时虽系教师，但实则完全与教师两样，经常受到歧视、打击、苛求，就是学生的辱骂也连连不断。当时我碰到很多的问题和矛盾，无处反映，无处说理，自己内心对此痛苦万分，难以接受。在经济待遇上我只能领到最低的生活费，勉强维持个人生活，可是在工作上又是担任最重的教学任务（历年高中毕业的三门数理课和高考辅导）。对此种处境我感到压力无比，难以解脱。至于我所学的专业知识根本得不到应用，而日益生疏荒废，所以从个人前途着想也感到茫然。这一系列思想活动和情感在我的日记中就不可能没有表露，在遇到外界刺激后，也就写过一些偏激、埋怨、气愤和不满的言词。

上述这些内容，就被构成所谓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恶毒攻击的罪证，并依此定为“罪行严重、民愤极大、死心塌地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无期徒刑”。然而无论从我日记的内容而言或是追究我

书写的动机、目的、原因、后果而论，这种判决都是不符合事实的，不符合党的政策的。

〈三〉更必须申辩的是，我的日记从未向任何人扩散流传，谁都没有看过。直到被抄查出来为止，它仅是自己一些思想观点的原始纪录，对客观外界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没有发生丝毫影响。就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之时，我的日记某些内容充其量也仅能证明我个人有糊涂错误认识甚至反动思想，需要批判改造。但它毕竟还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究竟国家哪一条法律规定，对思想意识问题就要处以无期徒刑，这的确是使人难以理解和信服的。

当然在任何时候，我都承认由于个性倔强一味追求民主、自由、真理，而学习不够又对自己缺乏严格的要求，所以日记内容就不可能没有错误观点。但是，现在看来，把错误思想观点作为判刑的根据则是错误的。

〈四〉十二年后的今天，我才提出自己的申辩，原因是不言而喻，人所共知的。我恳切期望和请求你们对我因书写日记有错误思想认识，而判处无期徒刑一案给予重新核实审理，按照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顺致崇高敬意

申诉人：郭家一

一九七八年十月

二十日

### ③北京大学的改正决定

#### 对郭家一同志一九五八年划为右派分子的改正决定

郭家一，男，四十一岁，原为数力系 55 级学生。

一九五八年郭家一同志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予以开除团籍处分。留校察看。

现根据中共中央[1978]55 号文件精神 and 一九五七年《中共中央关于“划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的规定，进行复查，原划郭家一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现决定予以改正。撤销对他的开除团籍处分。

关于工作安排、工龄计算、工资待遇等问题，待法院复查后，根据复查结果由现在所在地区县以上组织、人事、劳动部门按照中央五部“统发文[1979]第 143 号”文件规定办理。

撤销留校察看处分。

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章）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

十四日

### ④郭家一先生给山西高院的信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我叫郭家一，文化大革命开始，一九六六年九月因红卫兵抄家搜出我的日记，而被保德县公安局扣捕。一九七〇年三月被保德军管组判处无期徒刑。到现在已经整整十三年了。去年十二月我向保德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今年初也曾向你院提出同样申诉。为了你们能比较全面真实地了解案情的始末，现在我提出补充申诉如下：

〈一〉我是怎样被扣捕的。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因为当时我的右派身份，在学校已经完全处于被监督、管制、批判的地位。当学校中的一些问题被揭开后，一些当事人害怕他们的问题被学生进一步揭露，就背地煽动学生对我进行围攻，他们实际上对我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控制，百般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和污辱。我当时每日只能被迫去打扫学生厕所，完全失掉了人身自由。当然这些都打的是“革命”、“造反”的旗号。

八月底在校的工作组一方面宣布退出学校，另一方面宣布放假二十天。红卫兵通知我，让我也随即离校。可是因为我只能领到生活费，学校又一文钱也不借给，当时我身边只有十块钱，还不足路费，我曾向他们恳求，允许我继续留在学校，可是不答应。九月一日我只得用四块八毛钱购买汽车票一张，心想暂时离开保德再说。汽车开出不到一百米，被红卫兵拦截，勒令我和另外两名教师下车，理由是“牛鬼蛇神不许乘坐人民的汽车”。并命令“必须步行，自寻出路”。当时我只穿一套单衣，身边也只有不足五块钱和几斤粮票，无奈，我只好返回学校。返校后，红卫兵便对我的住室进行了抄查，将我的所有物品，包括日记、读书笔记摘抄，写的稿件、相片、信件全部抄查一空，旋即将我扭送公安局拘留。

因被抄家，我丢失大批专业稿件和物品，曾多次提出询问，最后回答是“国家那么多的东西还找不回来，你那点东西算什么”，“你是先捞命还是先捞财”。

〈二〉关于所谓“交代材料”。在我被扣押的三年半当中，公安局和法院没有对我进行过任何一次的审讯。仅在被拘留的第二天公安局预审股的翟大谋和一个姓任的以逼供为主，诱供为辅，让我写检查交代材料，他们说“你写日记，这算什么问题，是思想意识问题么，红卫兵现在去串联了，只要你把问题交代得彻底，认识得深刻，这表明你有认错的态度，又不会给你加什么罪，我们和红卫兵一说就放你回学校。你要知道你在这里只是寄押，早走晚走根本问题是态度”，“你还年轻，要珍视自己前途呀，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是知道的呀……”等等。

但是他们做的却是把我一人囚在一个阴冷的单间，根本不让放风，不给被褥，有时甚至连水都喝不上。直至十月二十日宣布逮捕之时，我全身还只穿着一套单衣，就是用饥渴、冷冻来折磨。

由于我不堪忍受这种折磨，加上出狱心切，心想这样下去用不了多少时间就会被折磨致死，我也亲眼看到过一个定为反革命的年轻人因为不堪忍受服过量药物自杀身死，而被拖出去了事。在极度恐惧、不安和混乱的状态下，在受到威胁感到绝望，受到利诱又妄图获免的矛盾心理支配下，我写了所谓交代检查材料，又由于他们逼要的很紧，写完后，我根本没有来得及做任何订对和复查，因此其中一些内容就有张冠李戴，因果颠倒，以至时间、地点、情节等与事实不尽相符之处。

可是当我一旦发现他们正是专门利用各种方式，把我的思想搞得极端混乱，思维失去常态的情况下，诱逼得到了所谓深刻检查交代材料，并以此做为定罪依据时，我一再要求有的地方需要改正，然而都已经无济于事了。他们连理也不再理了。在十月二十日他们突然宣布我被逮捕，我对他们这种做法提出异议，他们马上给我上了手铐。

六七年夏的一天，他们说“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成立了，可以给你解决问题了”。叫出去随便问了一下日记中英文字母是什么意思，平时和谁有来信，谁指使我写日记等。从此以后三年多再没有对我进行过任何一次审讯。我一再请求，却屡遭拒绝。我一直等待复审时，提出自己的看法，但都落空了。对他们的做法稍有不满意，便指使哨兵在夜晚对我进行毒打。在六八年冬又借清队为名，对我进行捆绑、挂牌、拧胳膊、毒打。当时将我打得满脸青肿，两只耳朵被揪得鲜血淋淋，根本不让我再说一句话。

这样一直到七〇年二月下旬一天凌晨，将我连捆带铐，押送至忻县。三月五日公判后，将我镣铐、绳捆整整一天，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不让解手，押至巡道车上脸朝地面，被人踩踏，几次晕厥过去，我的右臂至今仍落有残疾。第二日在保德县的公判大会上，他们还用绳子勒住我的嘴，还大叫“上嚼口”，使我满嘴流血不止。宣判后袁永义等人将我双手用铐子铐住，几个人将我的头强扭过一边，强行扭住我的手指，按指印多处，我当时什么也不知道。在给我判决书后，我请求申诉，他们却又给我上了铐子。

我所以说这些，就是要说明他们掌握的，并做为立罪依据的所谓“口供”“材料”是怎样获得的。

〈三〉判决上定我为“地主出身”，这也是他们强行加上的。事实是我从小都是靠我父亲的工资生活，解放后我父一直是教师，直到六一年因一般历史问题，被错误遣送回乡（现已纠正）。但是他们说“你



父亲是地主出身，你就是地主出身，以后你的子孙后代都是地主出身，这还有什么疑问”。

〈四〉关于判决说“书写反动日记近二十本，内容极端反动，除寄放其姐姐家中八本，投入黄河两本，焚毁一部外……”的真相。

事实是，我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写日记，断断续续约有二十本之多。在大学毕业离家时，将我没有带走的书籍、笔记，其中也有我中学时代的一些日记存放在我姐姐家中。跌入黄河的是我在六二年到陕西府谷听课时的听课笔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便失掉自由，因此我根本就没有给任何人寄什么日记和其它物品，也根本没有焚毁过我的日记和其它。

在以前的申诉中，我总认为他们过去采用刑讯逼供和欺骗诱供的方法，在当时也很普遍。并且办案人自己也很清楚，那些“口供”“材料”是怎么获得的，所以我在申诉中不想重提这些对他们来说并非很体面的事。但是我的问题，到现在拖推近一年之久，迟迟未决，梗阻再三。因此我有必要说明，过去他们既然能以逼供、诱供得到的“口供”和“材料”做为定罪的依据，直到现在迟迟不予否定，我现在则有权根据事实推倒和改正“交代”中的不实之词，以恢复事情的真实面貌。因此说它也根本不能做为复查的证据。

此致敬礼

山西省祁县 51 信箱 8 分

箱 郭家一

1979 年 10 月 4 日

#### ⑤保德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79)复判字第 7 号

郭家一，男，现年四十三岁。山西省宁武县头马营村人。一九五七年住北京大学时被划为右派。一九六〇年北京大学毕业分配保德中学任教。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因书写反动日记拘留，后逮捕。一九七〇年三月七经保德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审理以现行反革命判处无期徒刑。宣判后，在劳改期间，郭以原判事实不符和书写日记未在社会扩散为理由提出申诉，经本院复查审理查明：

郭家一一九五七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被错划为右派，受到开除团籍、留校察看处分，已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四日由北京大学予以改正。郭在保德中学任教期间，一九六六年从其家中搜出一九六三年以来书写的八本日记，把社会主义制度说的一团漆黑，对党、对毛主席和各级干部进行咒骂，对自己的命运前途表露了悲观绝望的情绪，内容反动，确属事实。但未作扩散，属思想范畴问题，不应视为反革命行为。故原以现行反革命定性判刑是不当的。为此，改判如下：

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保德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一九七〇年三月八日(70)保军刑判字第 3 号刑事判决书，无罪释放。

保德县人民

法院（章）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一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次日起，十日内向本院写出上诉状两份，上诉于忻县区中级人民法院。■

## 大饥荒岁月里的故事

## ——“反右”轶事拾零

严家伟

今秋为了看望阔别多年的“右派”难友，特别绕道去重庆拜会车玉生医师。车老今已年届九十，是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退休的骨科主任医师，中国著名的骨科专家。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415劳教支队“劳教”，文革中又被打成“反革命”，判刑15年送到四川省第四监狱劳改。是当时四监狱医院里顶尖的技术骨干。当时我也是四监狱的劳改政治犯。监狱当局见我年轻，又有点文化，就叫我在医院当一名“护士”。车老便成了我学医入门的启蒙老师，并跟随他一起作医务“临床”工作七、八年之久。因此，我们既有难友之情，又有师生之谊。

此前，我曾数次赴渝，他也两次来宜宾相会叙旧。但这次一别四年，车老明显地“垂垂老矣”了，心脏带着启搏器，上下楼都须人搀扶，再也不能像十年前那样陪着他去登临南山、黄山，瞻仰抗战遗址“复兴”雄关，中正故居，畅游南北温泉，令人不胜感慨。于是几天时间里，就只能陪着他促膝谈心。但车老仍思维敏捷，每天坚持记日记，写回忆录。可照顾他日常生活的那个小保姆，对此却有点持不同“政见”。她说“哎呀，车爷爷你好好休息嘛，一天到晚写这些几十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有啥用啊”？我听了连忙说“你错了，小妹妹，这可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这就叫抢救历史，留下历史，拒绝遗忘。你车爷爷就是一本活的历史”。小保姆对我的话似懂非懂，一脸疑惑地望着我。车老在我的“大力支持”下，好像焕发出了青春活力似的，于是翻开他厚厚的回忆录，讲出了一段沉痛而震撼人心的往事……

王眉白先生是中国杰出的医学家，抗日战争时期，因躲避日军侵略，迁来重庆。在当时战火纷飞，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从事卡介苗的研制工作。卡介苗是一种用来预防儿童结核病的预防接种疫苗。接种后可使儿童产生对结核病的特殊抵抗力。由于这一疫苗是由两位法国学者卡迈尔与介兰发明的，为了纪念发明者，将这一预防疫苗命名为卡介苗。王眉白先生是中国制成卡介疫苗的奠基人之一。在当时抗结核药还极其昂贵稀缺的年代，不知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

王眉白先生只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也是个医生，后来改行作医学检验，是重庆市一医院的检验师。1957年因为给领导提了点意见，就被打成了“右派”，送415劳教支队劳教。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大饥荒中，这位检验师，被饿得皮包骨头，全身浮肿。当时车玉生是415医院的医师。而王眉白先生是车的老朋友。他看见自己好友的儿子奄奄一息，却爱莫能助，只能给他注射点葡萄糖液，而当时葡萄糖也比黄金还宝贵，要院长批，所以形同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王检验师临终前在病床上拉着车医师的手无限悲愤地说：“车叔叔，你有朝一日回重庆一定去问问我父母，他们究竟还不认我这个儿子？为什么让我饿死，都不给我寄一点吃的东西来救救命……”说罢在哽咽含恨中离开了人间。

车老流着眼泪送走了好友的儿子，把他的话说也牢牢记在心中。当时415劳教支队，由于极缺医务人员，而象车玉生这样专家水平的人更是没有。于是他们便对车医师施点小恩小惠的“仁政”，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劳动力”的“积极性”（这是劳改队内部的专业术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笔者注）。他们给车医师摘掉了“右派”的帽子，还给了他一张按“技术干部对待”的“空头支票”。不过比其他那些“右派劳教份子”不但可多得几个钱，每年还可“恩准”回重庆探亲一次。

那年车玉生回渝探亲，望着妻子、儿女一个个饿得皮包骨头，真是心如刀绞。但他仍然抽空去了王眉白夫妇家。车老是个直性子，几乎用责问的口气问老朋友夫妇“你们怎么一点东西都不给儿子寄去，等他饿死，你们当真是站稳立场，划清界限吗”？王眉白夫妇一听，真如晴天霹雳，哭着答道“我们怎么没寄啊？我们每个月口中不吃肚中省地做成炒面粉，糖，油都用邮包寄了去，寄了还不放心，还去邮局复查……”。接着他们拿出一大叠邮寄包裹单，邮件复查单，上赫然盖着邮章，明白无误地写着“对方单位已收妥”！真是天大的怪事！那么多次寄去的食品，难道都被狗吃了？！

还用问吗？不就是那些穿着“军干服”成天绷着脸教育“劳教分子”必须“改造反动世界观，重作新人”的劳改干部们干的“好事”吗？除了他们，还能有谁？他们真不愧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他们抓住了“生”的机会，却把“死”的后果留给了“阶级敌人”。真是做到了雷锋同志说的“对敌人，象严冬一样的冷酷”！不愧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干部啊！

这位老科学家，王眉白老人当时就哭晕了过去。这位中国杰出的卡介苗专家，用自己的科研成果，不知挽救了多少孩子的生命，而他唯一的独生子，却被这几个猪狗不如的人渣谋害了性命！但这位老科学家，当时半个字也不敢向人提，否则，又是“诬蔑”、“恶攻”了。

刚才还在劝车老别再写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保姆，听了这个故事后，也显得一脸的惊诧莫名，她说“哎呀，真有这些事吗？好恐怖啊”！

没有被魔鬼抓去囚禁过的人，怎能体会得到魔窟内的恐怖？

隔了好一阵，车老才从回忆往事的伤痛中，缓过气来。趁着小保姆出去买菜的时候，又向我讲了一个似乎属“女孩不宜”听的故事。叫人听后，啼笑皆非。

也是在那个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岁月里，一天下午，住在415劳教队附近的一个贫下中农老大娘，怒气冲冲地跑来找着队上的劳改干部说“你们队上有个犯人，跑到我自留地里来偷我的菜，他要偷集体的我不管，他偷我自留地里的菜，那是我家救命的东西，我非找他不行”。那农民老大娘到也心直口快，把劳教份子喊作“犯人”，好象不知“我党”的政策，劳教是“最高行政处分”人家还有“公民权”呢。其次她说“偷集体的我不管”，偷我自留地里的那可不行。到也心直口快。于是劳改干部就问她“是哪一个，叫啥名字”？她说“名字我叫不出来，但人我一看就认得出来”。

于是劳改干部就把所有收工回来的“犯人”（不，劳教份子）集合排队站在一起，叫老大娘来认。老大娘左看看，右看看，一下就认出来了“就是他，就是他”！

干部一听，火冒三丈，马上叫人“给我捆起来，造蛋家伙，敢去偷东西，破坏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与革命群众的关系，反改造，反革命行为”！那人马上被五花大绑了起来。但他却并不“认罪”，连声大叫“冤枉呀，冤枉呀！你说我偷菜，你把我偷的菜拿出来嘛”！道理也是如此。俗话说“捉奸捉双，拿贼拿赃”总得有凭据呀。可那老太婆似乎胸有成竹，她说“我是没有抓住你偷的菜，但我亲眼看见你蹲在我自留地里，你在那里蹲着干啥”？那人忙说“大娘，我是在那里解小便”。老太婆一听哈哈大笑道“哪个男人解小便，会要蹲在地下才能解，你哄老娘这辈子没见过男人呀”？此言一出，引得劳教人员哄堂大笑。更有几个无聊的“看客”起哄凑趣说“对，对，对，他是婆娘变的，不敢站着屙尿”！那人顿时羞愧难当，恨不得地下有个缝，钻了进去。这时幸好车医师在场，他突然一下想起了，于是他挺身而出，高声叫道“大家别吵，这人我给他看过病，检查过他的身体，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他转身对劳教干部和老太婆说，“我们别在这坝子里说，一起到办公室去”。当时，大家都知道车医师是大城市来的名医。那时还没搞文革，还没有什么“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的诛语，所以在生理、医学方面的事，干部都要相信车的话。于是一起去了办公室。

原来那人数年前，因患阴茎癌，作了“阴茎全切除”的手术，根本就没有男人的阴茎了。其外阴部酷似妇女外阴，他解小便不蹲下，岂不流得一身都是尿？他当时可能一时内急，遂忘了“瓜田莫纳履，李下不整冠”的古训，幸有车医师，否则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后经几个干部一查看都忍不住笑了。那老太婆也说“哎哟，活了几十年我才头回遇见这种怪事。错怪你了，对不起，对不起”！

车老讲至此，无限感慨地说“那些人不解医，都无可厚非。但人家都残疾成这个样子了，还划什么右派，送什么劳教，还长期关在劳教队里强迫劳动改造。什么‘革命人道主义’，是挂在口头上呢，还是丢进太平洋里去了”？车老还说曾多次给干部反映说，这人应“保外就医”，可谁也不理。后来文革一到，车老都“升级”为“反革命”打入大牢，就更不知此人“后事如何”了。

这时小保姆摆上饭来，她说“你们刚才说得那么起劲，怎么我一来你们就不说了”？车老故作神秘地说“你小娃儿不能听”。小保姆故作生气的样子。我才连忙来“解围”，我知道小保姆爱唱歌，

这几天我见她边做家务都在哼唱流行歌曲。于是我套用了一句歌词说，我们讲的都是些伤心的事，“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把她也逗笑了。可这些“伤心的话”，明天哪说得完啊？

第二天，只好在互相依依不舍中和车老告别了。想着过去我们一道走过的岁月，更感到暮岁将至，来日无多，都黯然神伤。别前我给车老留下小诗一首，也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访友重来山城，  
正橙黄桔绿秋将晚。  
长江东去，嘉陵北流，  
参差广厦万间。  
往事堪悲，故人情重，  
与我长作竟日谈。  
更难忘，同游处——  
复兴故关，陪都遗址，（注）  
无不令人神往流连。

兴亡事，知多少？  
已化作一片过眼云烟。  
凭谁问：  
当年英豪安在？  
到而今，都付与  
渔樵闲话，废垒残垣！

注：抗战期间重庆为中国陪都，抗日圣地。一时多少豪杰。重庆市郊有地名曰“浮屠关”。蒋中正委员长将此处更名为“复兴关”，以宣示我军民抗日必胜之决心。曾与车老同游于此，指点关山，无限感慨。

2008年12月20日完稿■

## 吴家场记事

### ——我当生产队长的日子

陈仁德

**作者简介：**陈仁德，重庆市忠县人，生于1952年，忠县城关民办中学1968届初中生，1969年2月8日插队忠县复兴公社水坪大队（今复兴镇水坪村）当知青。后曾作报刊编辑、记者多年。现为中华诗词学会理事、重庆市诗词学会副会长、四川省诗词学会副会长。

题记：

有一个小乡场，在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可是在我的生涯中却占有一个永远的坐标；有一群人，他们从生到死都几乎不为外界所知，可是在我的心中却永远是那么鲜活；有一些故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可是却装点了我曲折的人生。

## 区委出台了新政策

和朋友们聚会，常听人说某某任什么官职，某某是什么级别，我却惭愧，因为我生平只任过人民公社时代的生产队队长，严格地讲，还是副队长。由于在中国除了军队称呼有正副之别外，地方上并无直接称副职的，所以我还是自称队长吧。

那是1974年冬，新一轮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又在全国掀起了高潮，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年的学大寨还配合了一项新玩意——学习马列的六本著作，即《巴黎公社》《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还有一本一时忘了），毛泽东随后又发表了最新最高指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要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既然他老人家说了“要使全国知道”，下面就马上忙乎起来了。

我那时22岁，是忠县拔山区显周公社的多种经营员，领着供销社的工资但是却长年抽出来做公社的工作，多种经营名义上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其实并没有什么全面发展，我一年到头就按公社的安排“转田坎”而已。

拔山区委在研究如何把农业学大寨推向新高潮的时候，出台了一个新政策，凡是公社干部一律到大队（现在叫村）去任职，党员任大队支部副书记，非党员任生产队副队长。这样，我就成了队长了。我任职的地方是显周公社安乐大队第八生产队，拔山区委还煞有介事地用老式钢板蜡纸刻写油印了一份《关于任命XXX等同志职务》的文件，其中有一行写着“陈仁德同志任显周公社安乐大队第八生产队副队长”，这样，我的生涯中便有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头衔——“生产队长”。

我的任期为半年，按照上级的要求，我必须每月在队上劳动25天以上，公社给我发了一份劳动手册，也就是用来登记劳动出勤的本子，本子比巴掌还小一点，淡黄色，由公社小学写字写得最好的黄新昂老师在封面上写着“安乐八队陈仁德”几个字。劳动手册每天如实登记，到时要交到公社去接受考核。

按照区委的统一要求，我到供销社的生产资料门市部去买了鍬子、手锤、锄头、蓑衣、斗笠等劳动工具，这差不多把我全副武装起来了。鍬子手锤是开山打石的工具，那时的所谓学大寨，主要就是在荒坡上砌石坎造梯田梯地，开山打石是首先要做的事，鍬子手锤必不可少，这样便花去了我每月20多元工资的近四分之一，心里略觉紧张。从知青生涯结束后，我是第二次当农民，将沉甸甸冷冰冰的手锤握在手中，便有些莫名的惆怅。我从来没当过石匠，笨手笨脚的，能胜任开山打石吗？

## 袖珍乡场上的众生相

背着被盖卷，带着新买的全套劳动工具，我来到了安乐八队。

安乐大队离显周场约10里，位于显周拔山新立三公社的交界处，安乐八队是大队的中心，坐落在一道山脊上，顺着山脊是一个古老的小乡场，叫做吴家场，当地老乡在叫地名时习惯将中间的一个字半吞半吐的快读过去，所以吴家场听起来就是“吴哦场”（同样的道理，附近的曹家冲就叫曹哦冲，王家咀就叫王哦咀，甚至供销社都成了供哦社）。这是我生平见过的最袖珍的乡场，它实在是太小了，街道从头到尾可能不到100米，宽度则只有2米多，最狭窄的地方站在两边差不多可以握手。路面全是青石铺就的，无数岁月从路上流走，石板已经变得非常光滑，没有一点棱角，有些地方深陷下去，坑坑洼洼凹凸不平。山脊像鱼背一样隆起，吴家场也就顺着山脊缓缓上升，成了一道长坡。两旁的房屋土木结构混杂，显然都已经“历史悠久”了，高高低低歪歪斜斜破破烂烂。但是即使如此，这场上却有着一个小诊所，一个小商店，一个打米磨面的机房，一所村小，所以，偶尔总会有人从场上走过，使这个仿佛化外之地的小乡场平添一段生气。

吴家场上总共只有十来家人，但就是这十来家人，也构成了一个小社会，里面有着个性鲜明的各种人物。

诊所的坐堂医生是当地负有盛名的老中医杨国旺，这个一年四季都身穿一件旧蓝布长衫，头上包着白帕子的老头，懒洋洋地坐在一排陈旧不堪的贴着“白芷”“半夏”“生地”“川芎”字样的中药柜前，似乎永远都将一支三尺长的竹烟杆含在嘴里吧嗒吧嗒吞云吐雾，只有当病人到来的时候，他才将竹烟杆恋恋不舍地从嘴里取出来，呸的一声将一大口痰吐在地上。

商店的老板叫黄仲荣，他其实是供销社的代销员，我早就认识。黄仲荣一共兄弟四人，分别以荣

华富贵命名，是吴家场上最能干也最有势力的人。黄仲荣在乡下称得上气度不凡见多识广，他眼睛圆圆的，嘴唇厚实棱角分明，脸略有些浮肿，坐在那个土垒的柜台里，态度温和地给人称盐打油，屋里到处都是湿漉漉的盐渍。“重庆那些大地方规矩多，有一回我到一个人屋里去，他撒了杆纸烟给我，又放了一个干干净净的盘子在我面前，我不晓得是做啥子的，不敢随便动，就悄悄看他到底是拿来做什么。嘿，你不晓得，原来是拿来抖烟灰的，哈哈——”他绘声绘色地讲着他曾经的见闻。

黄仲荣的老婆姓丁，一个很贤淑的女人，脸上随时挂着笑容，对客人很热情。他们的大儿子黄超群在忠县师范毕业后分配到附近的凌云公社小学当了老师，周末回家来，穿着当时最时尚的灯心绒衣服，他很像母亲，脸上也随时挂着笑容。

黄仲荣的弟弟黄仲华就住在隔壁，他比哥哥还活跃，眼睛大大的，戴着顶帽子，说起话来声音很洪亮，他每年养的大肥猪都是两三百斤重，这在那个时代是极为稀罕的，由于猪太肥了，到了年终宰杀时从圈里赶出来都很困难，但是他的脸上却因此堆满了灿烂的笑容。他女儿嫁给了当时区委副书记谢宗全在县林业局工作的儿子，这是非常荣耀的事情，他儿子黄亚群后来也参加工作进了烟草公司，他本人则成了公社的炊事员，后来正式退休。

另外一个弟弟黄仲贵是公社广播员，和我同一个食堂吃饭多年，彼此都很熟悉，也是个很能干的人。

住在黄仲荣对门的是刘松云一家，刘松云已经60多岁，但是身板硬朗，劳动起来抵得过年轻人，他眼睛似乎有些模糊，随时像有异物沾着，可能是白内障之类的东西吧，他夫妻二人养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刘光成，小儿子的名字没有多少人知道，因为是个哑巴，人们就叫他哑巴。我去的时候刘光成正好挨斗争，他和隔壁的周家媳妇发生矛盾，欺负周家懦弱，竟在大白天把周家媳妇按在石坝里公开猥亵，压得周家媳妇失魂落魄喘不过气，事后居然说：“把老子鸡鸡都搞扭气了。”为此，他被大会斗争，他上台挨斗时还恶狠狠地瞪着眼睛。

哑巴据说是小时吃错了药，后来就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了。虽然是哑巴，他却很精明甚至还有点幽默，喜欢比着手势和我开玩笑，他伸出两个大拇指并在一起，再把右手食指往下一按，就是调侃我——照结婚像了吗。后来我见到他也就对他比这个动作，他就哈哈大笑。这哑巴气力大得很，性情刚烈，在我去之前显周公社曾经发生过围攻知青当场致死的血腥事件，据说哑巴出手最狠，挥动粗大的尾部带着铁圈的打杵将年仅17岁的重庆插队知青“马儿”活活打死。此事几成定论，到底是真是假却不得而知，因为哑巴不能开口说话。

靠刘松云下侧的是黄家然，他儿媳妇叫刘纯芳，一个不到30岁的女人，和所有农村女性一样，肩上挑着一担粪桶奔走在山岭上，同时背上还背着吃奶的孩子，汗水沾湿了零乱的头发，从不叫苦，她和一般女人不同的是，嘴巴有几分风趣也有几分锋利，说起话来没有几个人可以抵挡。

和刘纯芳性格迥异的是住在场口外的一个叫冉瑞淑的年龄也不到30的女人。冉瑞淑是从附近老龙大队嫁到这里来的，生得白白净净，眼睛水灵灵的，扎着两条小辫子，在乡下可算出色的女人，她男人叫黄红，常年在新疆务工，家里就只有她带着两个孩子，大孩子不过两三岁（那时人们不知为何戏呼这孩子为“孔老二”），小孩子还背在身上。她平常总是用背带背着小孩子再把锄头扛在肩上，锋利的亮闪闪的锄头在孩子的小脑袋后面晃来晃去却永远不会伤着孩子。她不大言语，眼中似乎充满哀怨，活脱脱一个怨妇。当时为她家占用土地打地基准备建房的事情去找她谈过话，好像是占地手续不全，那块地基就在靠近吴家场的路边，已经用石条铺好的地基迟迟没有建房，地上已经长满了荒草。问她男人什么时候回来，她没有正面回答，只是低头望着自己的脚，淡淡的说了声：“那个懒汉——”吴家场上最有名的人是姚毛，方圆几十里没有不知道他的，他大名姚青术，出身贫下中农，刚翻身做主时大约也跟着分过胜利果实和田地，一度时期他还当过力夫，劳力很不错的，后来人民公社越搞越没吃，他就懒干活了，天天躺着睡大觉，久而久之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懒汉。他算得上最真资格的无产阶级，四十多岁了，没有老婆，没有房子，没有农具，简言之，没有任何财产。公社为了充分体现

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给他修了一个不足一丈见方的小土屋，他就睡在空荡荡的地上。他穿的是政府每年发的一件救济棉衣，天热了就把里面的棉花扯出来当单衣穿，衣服破烂不堪从来没洗过，上面爬满了虱子，臭气熏天。他的头发沾满了成年累月的赃物，一绺绺地纠结着，脸像锅底一样满是污垢，分不清五官的位置，只有眼睛眨巴时才露出一条缝隙。

他懒得出奇，从来不劳动，当然也就分不到多少粮食，由此他却锻炼出了惊人的耐饥饿的能力，可以几天不吃任何东西，躺在地上睡大觉，但是吃起来却可以一口气把一洗脸盆青菜汤吞下去或者把一个大南瓜硬生生地吃掉。他一年四季中最惬意的就是包谷成熟的季节，深夜里他像土猪（一种喜偷吃包谷的野生动物）似的钻进青纱帐里大吃包谷，据说他连把包谷从稿杆上扳下来的力都不愿使，直接就弯着身子把嘴巴凑到包谷上去啃，有人夸张地说，姚毛一晚上能啃一块地的包谷。到了腊月，村上开始杀年猪，姚毛会很耐心地站在一旁观看杀猪的全过程，他的真正用意当然不是参观杀猪而是有所期待，等到杀猪匠手执明晃晃的利刀把肥猪开肠破肚，将臭哄哄的猪肛门和猪羞剃下来扔到一边时，他一直眯着的眼缝里忽然发出亮光，一下扑过去将那些血淋淋的东西抓起来塞进嘴里大嚼并生吞下去。有时姚毛也能为生产队做点事，夏天，队里的堰塘干涸了，捞起来一桶小鱼，队上的十多家人便围着等待着分配，鱼有大有小，这下负责分配的人就有些为难，于是就把姚毛叫来，他抓起哪条就是那条，人们就算有意见也没啥可说的，姚毛不会白干，最后一条大鱼是自己的，他双手抓住就像啃包谷似的生吃了，可怜的鱼痛苦地摆动挣扎着，一会就被咬得支离破碎，姚毛满嘴是血，却吃得津津有味。也怪，他从来就不拉肚子，任何病都没生过，一生都没有花过一分钱医疗费。

姚毛一无所有却四肢发达，居然也喜欢眯着眼打量女人，偶尔会从眼缝里斜透出一种奇怪的眼神。他有个亲弟弟叫姚青灿，是生产队会计，也穷得叮当响，但好歹娶了个老婆，好象叫王宗兰，这王宗兰也跟着受苦，女人每月的那几天来了什么对策都没有，就让那东西顺着腿流，还照样上坡干活。就是这样穷，他们竟然一口气生了四个孩子，晚上一家六口挤在一张叽叽嘎嘎的破床上睡。这一切对于姚毛来说已经是共产主义一样美好的生活了，他心里便有些痒痒的。一天，黄仲荣对姚毛说：“姚毛，你天天睡地下，你看你弟弟那床铺多舒服，弟弟不在的时候你去睡就是噻”。姚毛听黄仲荣一说还真的动念了，那天看见弟弟不在，弟媳妇一个人睡在床上，就跑过去往床上挤，把弟媳妇吓得哇哇大叫，顺手抄起一把粗硬的扫帚照姚毛身上乱打，一边打一边大骂：“打死你这个烂鸡巴！”声音惊动了整个吴家场，其结果是姚毛抱头鼠窜，后来黄仲荣问他：“姚毛，你弟媳妇那床上怎么样？安逸吗？”姚毛耷拉着脑袋吞吞吐吐地说：“-----她-----拿扫帚疙瘩-----打我-----”。此事成了村民们津津乐道的“保留节目”，一直传诵了很多年，我去没多久就知道了内容大致相同的好几个版本。

## 深夜古庙里的怪异声音

我住进了吴家场尽头的村小——安乐小学。

安乐小学是一座古庙改建的，当地人都叫安乐寺。位于山脊最高处的安乐寺是吴家场最宏伟的建筑，建筑地基高出地面两米，显得很大气，说是古庙，其实更像一座古城堡。四四方方的大院，全是一条条整齐的石块砌起来的，山门开在正中，连接着一道宽大的石梯，石梯外是一个不规则的球场，其实就是一块土坝子，既小又不平整，下雨的时候一片泥泞。整个学校好象只有两个老师，从红色的木窗传出的琅琅书声，证明着学校的存在，也证明着现代文明对这个荒远山乡的渗透。

晴朗的日子站在安乐寺门口远望，可以望到几十里外的地方，那是一片类似高原的地貌，远远近近的山岭都低矮而舒缓，星星点点的村落分布在山岭之间，经过连续二十年的大炼钢铁、开荒种粮、改田改土等反复折腾，千山万岭都没有了森林，只剩下光秃秃的一个个山包，间或有几棵稀疏的树七零八落地点缀在原野上。在原野的尽头，有一道高山巍然崛起，连绵逶迤如同屏障横亘于天边，那就是忠县和垫江交界处的精华山（亦称金华山），精华山长长的山脊横拖过天际，锯齿一般的山巅在天

边布下一道暗黑色的嵯峨剪影，每天，太阳就是从那里缓缓地沉下去，当最后一抹残阳消失在天幕上时，精华山的轮廓渐渐变得模糊起来，漫漫长夜便开始到来了。

安乐寺里的一间小屋成了我临时的住所，白天古庙里书声琅琅，晚上便冷冷清清空无一人，这时，我便关上高大的山门，回到那间狭长的小屋里去，守着昏暗的煤油灯发呆。除了相伴我的几件农具，小屋里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幸而我喜爱唐诗宋词，在那些寂寞难耐的日子里，少得可怜的一点点躲过了文革劫火的断简残编就能让我神游远古，与圣贤对话，暂时忘却眼前的一切。

灭灯歇息后，古庙里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我从小受的是无神论教育，相信世界上没有鬼神，但是，夜半三更一片漆黑，空荡荡的古庙里发出的任何莫名其妙的声音都可能使人联想到鬼神二字，从而产生恐惧。有时那声音悉悉索索，就像有人趿拉着鞋在走路；有时那声音唧唧咕咕，就像有人在窃窃私语；有时声音会由远到近，最后就像在你面前；有时声音会戛然而止，就像有人在指挥。我从少年时就习惯性失眠，深夜里独自一人在荒山上守着一座古庙，听着各种怪异的声音，辗转反侧冷清寂寞，其滋味不是亲身经历万难体会。我知道，那些声音多半是山风和老鼠共同发出的声音。四面门墙紧闭，山风一进古庙就在里面打着旋子，成群结队的老鼠白天销声匿迹，到了晚上便猖獗起来，怎么不发出各种声音。老鼠的猖獗有时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它们居然到我枕头边来撒尿，害得我在黑暗中将床头捶得咚咚直响。在我离开时，我的枕头边沿已经被老鼠咬了好大几个洞，那是老鼠们趁我熟睡后干的。

八队的社员们和我混熟后就开始调侃我：“安乐寺里面以前停过好多死人，就是你睡的那间屋就停过吊死鬼，舌头吊出来好长哦。晚上你听到的声音是啥子，是鬼在打架呢。鬼的样子晃眼一看和人差不多，仔细看就不同了，鬼是没有下巴的——”

我是公社派来的，怎么能在社员面前说自己怕鬼呢，还不等他们说完我就说：“我不怕鬼！有啥子鬼哟，你们也莫信那些，那是迷信。”

话是这么说，可是到了深夜，恐惧总会袭上心头。一天晚上，一个社员从外面走夜路回来，路过安乐寺时看见我窗口灯还亮着，就大声对我说：“陈队长，还没睡呀。怕不怕，没有长下巴的，舌头吊出来的——”。那家伙还真把我吓到了，一通宵我都紧张，反复想象着没有下巴的鬼和舌头吊出来的鬼的模样，庙子里的声音似乎也特别异样。只要听到声音很近了，我就把手电筒掀亮照过去，偏偏手电筒又没电了，那才叫无奈。现在的人们可能不知道，那时电池是非常紧缺的物资，市场上根本买不到，所以电都耗尽了还在勉强用，只能发出一点萤火虫般的微弱光线。那一夜真不知是怎么熬出来的。

## 这一餐饭我终生难忘

安乐八队的社员们很多年来一直生活在饥饿和半饥饿状态中，粮食匮乏一直是他们最大的难题。共产党执政二十多年来，虽然天天都在高唱“社会主义好”，可是当你面对那一张张营养不良面黄肌瘦的脸、一双双没精打采黯淡无光的眼睛和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模样时，你才知道他们到底是过的什么日子，他们的贫困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我出任生产队长，竟使全队人感到为难，难什么？难在我每天要吃饭！

山区的农民非常朴实善良，从古到今，他们都是好客的，家里来了客人，要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款待，生怕客人吃不好。但是，现在他们的确贫困到了无法款待客人的境地，他们为难了。

但是，总不能不让我吃饭啊。队里的几个干部经过反复商量，最后决定全村十多户人家轮流接待我，每家负责15天，先从生产队长家里开始。这种轮流供养的方式俗称“吃零供”，大凡老人到了不能劳动的时候，就由几个儿子轮流供养，也就是“吃零供”。我这个生产队长本来是去领导他们学大寨的，却成了他们无法推卸的包袱，这也算是那个时代的特色吧。

第一天就到了队长家。队长叫向志元，30左右年龄，戴着一顶已经变成灰白色的帽檐耷拉下来



的蓝布帽子，衣服也是灰白色的旧蓝布，上面重叠着补丁，个子有些瘦小，见到我，叫了声“陈队长”，笑容中带着几分朴实几分苦涩。

向志元的家在杨国旺诊所的背后，房子是老式的木屋，和吴家场上所有的房子一样，都已经饱经沧桑了，里面拥挤而狭窄，而且非常阴暗，屋里最重要的财产就是一张宽大陈旧的木床，上面堆着至少用了两代人的发黑的老棉被，床上是四季不变的四角残破的竹篾席——当时整个忠县农村都是如此，即使是像黄仲荣那样条件较好的人家，也从来没听说过在寒冷的冬天使用床单的，一律都是睡冰凉的篾席，而且是很粗的黄篾席，能睡上细密的青篾席，那就算高档次的生活了。

到向志元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张“吃饭登记表”贴在墙上，这是当时干部下乡的规矩，“吃饭登记表”上面竖列着从第1天到第15天的日期，横排着早中晚的餐次，每吃一次，就在上面划了个小圈，到了最后，数一数有多少个圈，再按照当时的伙食标准，每顿0.11元钱，3两粮票，一手交给主人。

向志元看见我在贴“吃饭登记表”，大声说：“陈队长，算了吧，莫去贴，说起都不好意思哟”，我坚持要贴，说这是我们的制度，必须要执行。向志元还是不让我贴，最后在我一再坚持下才终于贴上墙了。

向志元一家三口，老婆是个很本分的女人，头上包着帕子，散乱的头发从耳际垂下，她也只有三十左右，但是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得多。她和我招呼过后，就不言不语地只顾蹲在地上剁猪草，菜刀反复地举起又砍下，发出有节奏的“砰砰砰”的声音。儿子乳名“云崽”，刚上小学，就在安乐寺读书，也和他爸爸一样，戴着一顶灰白的帽子，连笑容都和他爸爸一样，朴实中有几分苦涩。

我对农村并不生疏，多年的插队生活，已经使我和农民有了很深的感情，我不论到哪里的农民家做客，都能迅速和他们交上朋友，打成一片。至今我都反对城里人无端歧视农民，每次看到农民在城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就想为他们大声疾呼，我的这种思想感情，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有一句经常挂在人们嘴边的话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是用来比喻要想做成一件事情，必须具备必要的条件。但是真正的“无米之炊”，又有多少人体验过呢？我到向志元家吃饭，算是真正让他老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那时农村的口粮每人每年只有两三百斤，其中主要是红苕玉米之类的粗粮，大米少得可怜，有一点点米，家家都要留来待客，而待客时，女人是不能上桌子吃饭的。我估计，那时农村的家庭主妇，一年四季根本就没有机会吃上几顿米饭，完全是菜蔬红苕充饥，

看得出来，向志元的老婆为我的伙食颇费筹措，她一定想把饭菜做得好一些。她把黑黑的盐罐掏了又掏，拈出半粒水果糖大小的一点黄色的东西来，丢到烧红的大铁锅里去，用锅铲使劲压在锅底，发出一阵阵“兹兹”声，随即冒出一阵油气，原来那点黄色的东西是极其珍贵的猪油！农民那时是绝对没有机会吃猪油的（什么油都不行），条件好点的家庭如果一年到头能养肥一头猪，宰杀后必须将其中的一半边交给国家，称为“边口肉”，剩下的一半边才可以自己吃。由于粮食奇缺，人的口粮都不够，哪里还有多少用来喂猪呢，所以即使肥猪出槽时，也只有百来斤毛重，除去皮毛污物等等，再交一半边给国家，就剩不了多少了。其中最宝贵的就是猪油，大概有两斤，这两斤猪油要吃整整一年，农家的主妇们就将其切成一粒一粒的放进盐罐腌起，等到有客人时再拈一点出来炒菜。我所看见的正是这个场面。向志元的老婆见猪油煎得差不多了，就把一大笕箕青菜倒进锅里，只听见“扑哧”一声，那点可怜的猪油就没了一点踪影。

她又拿出存放了很久的一点点米，大约有二三两吧，放进一个小茶缸里，再小心把茶缸搁在一大锅红苕面上，盖上硕大的锅盖，就用猛火蒸起来。等到一大锅红烧都熟透后，那一小茶缸米饭也发出了阵阵香气。

到了吃饭的时候，几大碗热气腾腾的青菜端上桌来，另外还有一碗黑乎乎的东西，原来是红苕豆腐——用红苕磨制的淀粉做的豆腐。最动人的场面出现了，那一小茶缸米饭端到了我面前，是专为

我蒸的，他们的碗里无一例外地盛着山一样隆起的红苕。

这时我看见了一双可怕的眼睛，那是云崽的眼睛。不到十岁的云崽站在桌边，双手捧着碗，眼睛直直地向我面前的米饭看过来，那眼神中充满了渴求、向往和压抑，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我觉得握筷子的手有些颤抖，愣住了。

“云崽”，向志元轻轻叫了一声，示意儿子不要这样。但是云崽仿佛什么都没听到，喂进嘴里的半节红苕都忘了吞，就直直地盯着我面前的米饭。

“云崽！”这次向志元大声叫了起来，才把云崽叫“醒”了，赶紧把半节红苕吞了下去。然而，只有几秒钟，云崽的目光又一次射了过来，就像沾住了似的，不再离开。

“云崽啰——”，向志元这次的口气不再严厉，只是非常无奈。

我还一口也没吃，怎么吃得下，起身把米饭推到了云崽面前，“吃吧”，我对他说。他迟疑地仰起头来看着他爸爸，没敢动手。

“云崽！”向志元又严厉起来了。

我叹了口气，端着那点米饭走进灶屋，全倒进了红苕锅里，然后我自己盛了满满一碗红苕走出来。

“陈队长——这、这——这才不好哦”，向志元脸上挂满了苦笑。

这一餐饭，我终生难忘。

以后我轮流到每家吃饭的情况都大约如此，主人热情而尴尬，脸上挂着苦涩的笑容。我深深地为他们的淳朴和厚道所感动，也为他们的贫困和无奈叹息，我忘不了他们，曾经在最困难的年代照顾过我的伙食，虽然是粗蔬充饥，却让我感受到了山民的善良。他们一个个都那么勤劳，本来是不应该挨饿的，可悲的是那个荒唐的时代，几乎堵死了一切可以让他们自由发展的道路，在当时，那叫做“堵死资本主义的路”，有一个很流行的口号是“不堵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好象到处都是可怕的洪水猛兽一般的资本主义，这真是太委屈他们了，因为他们连资本主义的影子都没看到更无缘享受，社会主义他们倒是见识够了，那就是极度的贫困。

## 辛辛苦苦造“大寨田”

就在为填不饱肚子发愁的时候，农业学大寨的浪潮却一浪高过一浪，一会儿这里在开誓师会，一会儿那里在开现场会，登台讲话的人总是声嘶力竭地把声音提到高八度，加上高音喇叭播放，声音就像滚滚惊雷直冲云霄。

在我的记忆中，还是在文革前全国就开始学大寨了，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到处都在唱“学习大寨呀赶大寨，大寨红花遍地开”了，到了文革，学大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我在农村插队时，一切活动言必称大寨，口号铺天盖地而来，像什么“学大寨人，走大寨路”“干部学陈永贵，社员学大寨人”等等，年年都少不了的一句口号是“学大寨，跨农纲”，用石灰浆在那些山崖石壁上刷出醒目的巨幅标语，第二年又在老地方再刷。“跨农纲”是怎么回事，现在可能没多少人知道了，有必要简单诠释一下。农纲是中央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简称，其中有一条内容大致是，长江流域的粮食生产要实现亩产800斤以上。所谓“跨农纲”，就是实现亩产800斤。我清楚地记得，岩石上的口号先后写过“七〇年坚决跨农纲”“七一年坚决跨农纲”，我曾经对一个知青朋友说，其实明年这标语不用重写，只改一个字就行了。

到了冬天，要变冬闲为冬忙，搞得村村紧紧张张，连大年三十正月初一都不准农民休息一天，全部都得到山坡上去干活，美其名曰“过革命化的春节”。农业学大寨有许许多多的内容，但是除了虚张声势外，落到实处就只剩下一点——造田，具体讲，就是在坡上用石条砌一道坎子，里面填土种庄稼。这个工作后来发展到了搞“人造小平原”，也就是把范围做大一些而已。从六十年代起，造田的工作就没有停过，每年到了冬天，社员们从早到晚在山坡上开山打石甚至放炮炸山，硬是要在山坡上

造出梯田来。本来，改田改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谁不想把田园建设得更富饶美丽呢？但问题是，必须因地制宜，不能全国一窝蜂，如果不从实际出发，就肯定会失败。经过长期政治运动熏陶的中国人，已经学会了跟形势走过场，从来只重过程中的态度而不重结果是否有实绩，在此情况下，学大寨当然只能是一场闹剧。

我去安乐八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带领社员们学大寨，去不久，全大队就制定出了当年的学大寨计划。按照公社的指示，彻底改变以前小分队作战的做法，实行大兵团作战。以前是每个生产队各自造田，由于劳动力少，所以造田规模一直很小，现在改为将几个生产队的劳动力集中在一起，一个队一个队造田，当然就能扩大规模了。全大队九个生产队分三块，分别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我所在的八队属于第三块。为了使每一个队都能受益，决定每年突击一个队，转战三年把全大队改造完。

七八九三个生产队先从九队开始，说干就干，在一个严寒的冬日，我拿着鍬子手锤和几十个农民一起走向了位于九队的一个荒草坡。

这是一个坡度约 50 度的山坡，坡上原来只有一些零星分散的一丈左右的小块土地，小块土地之间是间或冒出地面的青黑色的巨石和灌木杂草。我们的任务是就地取材，将那些巨石开出来顺着山坡砌一道长长的石坎，把那些零星分散的小块土地全围进去，再到旁边山坡挑来一些泥土，高低拉平，做成一块梯地。

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很难，工程依靠的不过是一些原始的工具和一些饿着肚子的瘦骨伶仃的劳动力。这个场面有些滑稽，口号都是气壮山河的，什么：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大干快上，改天换地！但是，在工地上劳作的人却无一个不是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无精打采，这样造出来的梯地是什么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一切劳动都是沉重的体力劳动，最艰巨的是大锤破石。那些像房子一样大的石头，全凭手工一点点打开，岂是容易之事。石匠们要先在石头顶上打出一排“楔眼”，每个“楔眼”间距不到一尺，打好“楔眼”后再把铁“楔子”一个个插进“楔眼”里，这时大锤手便挥动大锤依次向每一个“楔子”砸去。大锤手需要有非常好的体力和熟练的技术才能挥动大锤并准确地砸到只有一寸见方的“楔子”上去。大锤足有 20 多斤重，有一尺长，在中心位置穿过一根长长的桑树枝做锤把，大锤手握住锤把长长地运气，嘴里哼着悠长的山歌一般的号子，等到气运足后，就双手提起大锤，一边继续哼着号子，一边将大锤慢慢从侧面移到背后，长长的有几分柔软的桑树枝连着的大锤悬在大锤手屁股下面前后甩动，这时大锤手仍哼着悠长的山歌一般的号子，其实这是在积蓄力量和瞄准“楔眼”，等到一切就绪后，大锤手将悬在身后的大锤慢慢举起来，锤把弯得像弓，忽然大锤手爆发出惊天动地的一声猛喝：“嗨！”，沉重的大锤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便“当”的一声砸在地上的“楔子”顶上，闪出几点金色的火星。

这个姿势实在是很伟岸的，我写到这里，眼前又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在高的巍峨的岩石之巅，一个赤着胳膊的大锤手将沉重的大锤举过头顶，他的背后是无边无际的蓝蓝的天空，斜射过来的阳光将他手举大锤的姿势定格成了一个美丽的剪影。

可惜从来没有画家留意过这些大锤手，不然，一定会画出震撼人心的作品来。

巨大的岩石靠“楔子”一点点地胀开裂缝，然后轰然裂成两块，再用同样的办法一分二，二分四，直到破成一块块砌坎子的石料，“大寨田”就靠这样一点点地造出来。

我的手锤和鍬子这时派上了用场，其他技术性强和体力强的事我做不了，我就在那些已经很小的石头上打“楔眼”。这是石工中最基本的也是技术含量最低的劳动，看上去好象轻巧，手锤打在鍬子上发出有节奏的叮当声，其实不然，我一打就“黄”。熟练的石工眼睛是不看鍬子顶端而只看鍬子尖的，而我必须看着鍬子顶端，怕手锤打偏了落到手上，人们就笑我：“陈队长，哈哈，打不来“楔眼”，我也就学着不看，这样，握着鍬子的手就被手锤反复锤打，痛不可当。我好不容易打了个“楔眼”出来，却插不稳“楔子”，还要别人来返工。

说实话，我是发自肺腑的佩服那些农村的汉子，他们拿起锄头就是农民，拿起鍬子就是石匠，拿起篾刀就是篾匠。一般的石工活，自己拿起鍬子手锤就做了，根本不请石匠；一般的竹器，自己砍根竹子来就编织了。几乎家家户户的男人都是如此，我不佩服都不行。

砌坎子的石头远一点的就抬，近的就用手搬（翻滚方言：抽），有一次，我和另外几个青年一起搬一块石头时，由于石头太重，不小心砸到我左脚踝骨上，几个青年赶快一起使力将石头搬开，我痛得站不起来，还好，只是表皮受伤，但是从此脚上却留下了伤痕，直到现在还隐约可见。

经过辛辛苦苦造的劳作，我们终于造出了一块“大寨田”，但是就在第二年春雨时节，这块“大寨田”就被冲垮了，砌坎子的石头冲得七零八落，我们算是白忙了一场，其实，那几十年有多少事不是白忙了呢？

七、八、九队按照联合作战的部署，要三年才能依次完成，到了第二年，已经没有人提起过这件事，那时又有了新的“战略部署”。七队和八队的人也算是白帮了九队的忙。

## 改造懒汉姚毛

不管农业学大寨搞得如何轰轰烈烈，吴家场上的姚毛是绝不参加的，他裹着那身从来不换洗的破衣服，赤着脚，双手袖在一起，眼睛眯成一条缝，静静地倚在他那个残缺的土墙上养神，连苍蝇叮在脸上他都难得挪一下身子。他心里琢磨着的是，下一顿饭怎么解决？其实在这里使用饭这个字很不恰当，饭是指的米饭，那里有米饭啊？就连猪狗食也难找到。但是不用饭字还真找不出准确的字来，只好姑妄用之。

我年轻幼稚，居然想去改造姚毛，让他“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学大寨运动中来”。

我想得先和他建立一点感情才有利于改造他。那天很冷，我看见他龟缩在街头，裤腿掉了一片，赤脚冻在风中。我从他身边走过时心中忽然一动，觉得这个“翻身做主”二十多年的贫下中农很可怜，我的脚步停下来，在他面前踌躇了一会。这时旁边不知是哪个女社员笑着大声说：“陈队长，你敢不敢把你脚上的皮鞋给姚毛穿！”我回头看了看那个女社员，说：“怎么不敢！”，随即就当众把自己脚上穿着的一双反毛皮鞋脱了下来。姚毛面对突然发生的事情露出了几分惊讶，一直眯着的双眼居然慢慢睁开了一半，但是旋即又眯成一条缝，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那神态才真是宠辱不惊。我用脚尖把鞋挪到他面前，让他相信，我是真的送给他，他依然没有任何反应。我赤着脚走开了，身后是社员们的嚷嚷声：“姚毛，陈队长把皮鞋脱给你了！”一会我回过头去，姚毛已经把皮鞋穿在脚上，又恢复了原来的姿势，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毫无疑问，这是姚毛生平唯一的一次穿皮鞋，就因为这，他永远记住了我。

我对社员们说：“我要叫姚毛去出工做活路（方言，即干活）”，他们听了竟然哈哈大笑，说：“你有那么大的本事？不知道有多少‘工作同志’来搞过了，四清运动的时候，区委书记周善国把自己的工资拿来买锄头镰刀给他，又给他买衣裳，还烧水亲自给他洗头洗澡，说是啥子阶级感情，结果他还是不做活路，天天吃了就睡。你想叫他做活路，哈哈——”

社员们这样说，我反而更想去试一试，那天早上，我走进了姚毛的小土屋。

这是个什么土屋呢？纵横不到一丈，屋檐很低，要弯着腰才能进出，土墙四面都是裂缝，墙体已经开始剥落，屋顶盖着麦草，整个土屋没有窗口，也没有门板，只是在垒土墙时留了一个窄窄的缺口，就算是门。

我刚要跨进去，冷不防迎面飞起几只母鸡，扑腾着翅膀咯咯地惊叫着从我耳边飞过，把我吓了一跳，原来这些母鸡都在里面做窝，和姚毛已经很熟了，突然有生人进去，便吓得惊飞起来夺路而逃。我定了定神跨进去，眼前的一切让我触目惊心，我发誓这是我从没见过的人类居住地。姚毛睡在冰冷的土地上，盖着黑色的像烂油渣一样的破棉絮，他睡的那片地皮已经磨得有些光滑了，但是就在旁边仍然有一些小草的嫩芽从地下冒出来，他的头部有几块高低不一的零乱的石头，大约是他的枕头吧，

几只胆大的“抱鸡母”就偎依在姚毛的脑袋边，鸡爪子在姚毛的头发上乱抓。“床”前有三块小石头，搁着一个只有半边的小铁锅。土屋里除了“床”，其他地方有多处明显的屋顶滴水浸润的痕迹。

这就是姚毛之家的全部内容！我相信，即使在遥远的山顶洞人时代，人类生存环境也不过如此。我当时来不及想什么，就想把姚毛叫去参加劳动，我就大声喊：“姚毛，姚毛！”，谁知他根本不理睬。我连着喊了好一阵，他都没一点反应。

我想了个办法，抡起镢子手锤在他的“枕头”上打得叮当直响，被打飞的石头渣滓落到了他头上，他居然还是没一点反应，就像死人一样。

“姚毛，起来，出工了！”我反复地大声喊，但是始终不起作用，这家伙真是修炼到家了。我想伸手去拉他起来，可是他实在是太肮脏了，我不敢碰。

我决心要把他叫起来，回头找来一根硬邦邦的扁担，我把扁担从地上伸进他的身子底下，大叫着：“姚毛，起来！”，使劲往上抬，我想这下他该起来了，谁知他连吭都没吭一声，挪了一下身子照样呼呼大睡。

我的汗都出来了，他还是不为所动。一个道地的农民，贫下中农，怎么会懒惰到这种不可思议的程度呢？

我这下没招了，只好承认我对姚毛的改造彻底失败。

我向城里向朋友们讲姚毛的故事，他们都不相信，认为是我夸张的，其实完全真实，没有一点虚构。后来城里有人到显周来看我，我就把姚毛作为一个“景点”，带他们去参观，当他们跨进姚毛的土屋时，无一个不震惊，不得相信了眼前的事实。

姚毛的故事还多，但是实在太恶心了，所以略去不讲，只说后来那间土屋在风雨中终于垮掉，姚毛睡到了打米磨面的机房里，他的眼睛慢慢瞎了，情况更糟糕，那时我已经“任职期满”离开吴家场很久。有一次我回到吴家场去，姚毛蜷伏在地上已经认不出我，我喊了一声：“姚毛，你听得出我是哪个吗？”意想不到的，他竟然一口就说出：“你是陈队长”。旁边的社员说：“他怎么记不到，你给他一双皮鞋呀”。

## 办政治夜校

在勒紧裤带学大寨的日子里，我还有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组织社员们学习马列的六本著作和“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

吴家场上的农民们基本不识字或者识字极少，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生活的半径没有超出过50华里，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对山外的世界一无所知，更遑论整个国际社会，在极度封闭的时代，即使是农民中那些极有智慧的人，也无从了解中国之外的世界，对于所谓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部了解，就是那里的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着我们去解救。本来，他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去知道“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没有必要去知道什么“巴黎公社的原则”，他们祖祖辈辈都平静安详的生活在这块群山环抱的家园里，他们虽然有贫困、疾病和烦恼，但是也有自己的快乐，并不像有些人反复鼓吹的那样长期生活在阶级压迫和剥削中。1949年以来，不知政治为何物的他们，被无情地卷进了政治漩涡中，他们的一切都和政治捆绑在一起，不再享有宁静的牧歌式的生活，在“翻身做主”的光环笼罩下，他们开始忍受前所未有的饥饿和无休止的劳役，不仅如此，他们还要一次又一次的被强迫去“学习”那些与他们毫无关系的走马灯一样变着花样的“政治理论”。现在，轮到他们学习马列的六本著作了。

按照当时最吃香的做法，组织学习叫做办政治夜校，教室是现成的，就在安乐小学我住的房间外，教材也是现成的——“马列的六本著作”，教师当然就是我了，我是队长，又是公社派来的，在吴家场无疑也是文化最高的人。

于是，在一个黑沉沉的夜晚，安乐寺的教室里点亮了几盏油灯，二十多个人坐在我的面前，听我

讲“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

自成年以来，我就对什么“光辉理论”之类的东西缺少兴趣和研究，而且，我自己确实也非常肤浅，中学只上了一年就“停课闹革命”了，没有读过什么书，对《巴黎公社》《法兰西内战》什么的根本不知道，但是我毕竟还认得些字，赶紧把那些书看看，也就知道了什么“茹尔法夫尔”“梯也尔”“俾斯麦”等等。可怜的是我面前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有的人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起，甚至根本就没有名字，现在要他们来听这些“光辉理论”，简直比听天书还难，但是，毛泽东说了“要使全国知道”，他们就没有理由不知道。

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看见60多岁的刘松云也佝偻着身子坐在那里，一种莫名其妙的目光从他模糊的眼眸中透出来，他显然想努力地听懂什么是“茹尔法夫尔”，但是完全没用。看得出来，他吃力的程度远远胜过了开山打石头。

这无疑是世界上最喜剧的事情之一，一个根本不懂的人很认真地在上面讲，一群根本听不进去的人在下面很认真的听。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特征，所有荒唐都极其庄严地上演着。

这样的夜校当然是不能持久的，和那时所有昙花一现的“新生事物”一样，办了两次后就再也没人来了。

## 落日满山岭，悠悠总是情

1979年春天，我调进县城工作，从此没有多少机会去显周公社和吴家场了，但是心中却时常挂念着那里的一草一木。八十年代的一天，我终于找了个机会去吴家场，我还没有走到场口，就被在坡上劳动的人认出了，他们放下锄头，拉着我的手说不完的话。我走进曾经非常熟悉的小乡场，眼前浮现出当年的历历往事，真是感慨万千。这时当年的孩子们已经长大了，都还记得我，争着拉我到家里去做客。经过土地承包，农村的面貌大大改变，吃饱肚皮已经不成问题，和当年相比，土地减少了，人口增加了，劳动轻松了，可是粮食反而多了，再没有了饥饿，可见只要不反复折腾，国泰民安丰衣足食并非难事。我特地问了姚毛的情况，才知道他早死了，没赶上吃饱肚子的时代。

当天，我写了几首诗，其中一首是：

依依昔日景，眼底认分明。落日满山岭，悠悠总是情。

这首诗写得并不好，但是我却很喜欢，因为其中有我难忘的一段岁月。二十多年后，我在重庆采访市委副书记甘字平时，把我的诗集《云气轩吟稿》送给他作纪念，不几天，他给我送了一幅他的书法作品（他的书法较有品位，重庆很多地方有他的题字），四尺整宣，打开一看，竟是上面这首诗。我的诗集里有300首诗词作品，他怎么就选出了这一首呢？读着甘字平书写的条幅，我眼前又出现了吴家场，那个我曾经当过生产队长的地方——街道从头到尾可能不到100米，宽度则只有2米多，最狭窄的地方站在两边差不多可以握手，路面全是青石铺就的，无数岁月从路上流走，石板已经变得非常光滑。

哦，落日满山岭，悠悠总是情……

2007年9月21日星期五于重庆临江门■

## 长忆写《秋风辞》的罗少云同学

### 青 山

一九六二年，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办的壁报吸引了很多人。我班同学罗少云有感于一些同学经不住“自然灾害”带来的饥饿的考验（轻则分饭时挖同学的“墙脚”，重则偷伙食团的面粉）。他为了鼓励同学们战胜困难的志气，在壁报上发表了《秋风辞》，他的女友还为他配画了秋风中傲然挺

立的一棵劲松。

不料，到了一九六三年上半年，根据上级指示清理整顿学生出的壁报，有人把《秋风辞》定为毒草，说作品中的青松是个人主义的象征。在班上组织批判《秋风辞》时，我发言认为这是一次学术讨论。我充分肯定作者的立意是好的，只是阳关三叠似的诗句“秋来也，秋风凉”的咏叹，可能会起“劝百讽一”的作用，因此，我建议作者在诗中还应加强讴歌青松不怕困难，战胜困难的大无畏精神。会后，传出远在市里开会的班长的意见：“何青山在为毒草辩护。”

毕业考试结束后就是毕业鉴定。要求每人在一周之内认真写好自我鉴定。这期间的一天下午，班团支书对我说：“Y辅导员叫你去系办公室一趟。”我到了系办公室，一个矮小而敦实的青年人招呼我坐下。我认识这位Y辅导员，他高我一个年级，前年他补考古典文学史，还到我们六四级来听古典文学史课，每次都坐在最后一排。

“你就是何青山？”Y辅导员问。

“是的。”我答道。

“W和你同住一个寝室？”

“大二时同寝室一年。”

“那你仔细回忆一下，他平时有哪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言行，下去给我写一个材料来。后天交给我，去吧。”不由分说，Y辅导员就打发我走了，接下来他还要找好多人谈话布置工作哩。

我回到寝室后想，这不是叫人打小报告吗？我前思后想，终于在一张小纸条上写道：“W同学在一次小组学习会上谈寒假见闻，说他们农村饿死了人。”

过了两天，我来到系办公室，Y辅导员正在找同学谈话。当我把小纸条递给他时，他从眼镜下面瞟了纸条一眼，说：“等一下，我马上给你批。”他以为我来交请假条。当他谈完话，那位同学离开办公室后，他仔细看过纸条，勃然大怒，把纸条扔给我说：“何青山，我认得你！”

Y辅导员似乎想起了什么，他伸出手来对我说：“把纸条给我。”

“不给！”我说。

“给不给？！”Y辅导员双眼圆睁威胁道。

“你强迫我写，就是不给！”我转身迅急地离开了中文系办公室，随手把那张差点去制造罪孽的小纸条撕得粉碎，顿时，心中好像有一块大石头落下地一样轻松。

当天晚饭后，我从中文系第六学生食堂走出来，在通往男生寝室的斜坡石板路上，碰见了在前面走的W同学。他不敢回头，但用右手背在腰部竖起了大拇指表示对我的赞美和感谢。W，四川达县人，据说出身不好，但本人平时呐口少言，对同学诚恳热情。他毛笔字写得好，擅长油画，有时利用节假日帮照像馆画背景画找点零用钱。有同学向系上揭发他，说他曾经在寝室谈过，他远在达县山区的一些农村的穷亲戚家里饿死过人。因此，系上在毕业鉴定时，把他作为批判的重点之一。

过了几天，班团支部书记找我谈话：“你最好主动去向Y辅导员道歉，否则他真的不好再下班来了。”“我没错，我不去。”我断然拒绝了团支书。

不久，小组鉴定开始了。我所在小组有13人，组长故意把我安排在最后一个鉴定。当我读完自我鉴定后，大家七嘴八舌但众口一辞说，通不过。我感到最意外的是同寝室的L的发言最让我受不了：“何青山，你既然为《秋风辞》辩护，而《秋风辞》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难道你没有其它三反思想和言论？！应该老实向组织交代。”

L同学是我的老乡。五班有七个成都人，他算一个。平时他和我的关系还是挺好的。记得大三时，他偷偷地爱上了外语系的一个女生，他为这位女生写了大半本爱情诗。一天早饭前，他慌慌张张跑来告诉我，说本子不见了，请我一同帮他找一下。最后我俩终于在中文系食堂背后坡上的草丛中找到了这个本子，他当即面对本子作揖磕头，我也为此十分感动。多年以后，他向我表示他为自己鉴定会

上的发言而后悔和内疚。我当即表示决不怪他，其实他也是受害者，他和另外一些同学都是当时组织上事先叫去开了会，告诉他们每组都有被批判的重点人头，矛头要集中对准。其实，他本人也是被列入有问题同学中的，最后他分配到陕西那离成都故乡遥远的地方就是一个证明。当然，这些都是后话。组长宣布鉴定会休会，让我重写自我鉴定。我想起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在毕业鉴定动员会上的讲话，就不寒而慄：在鉴定中有问题的同学，如果小组鉴定不了，就拿到全班去鉴定。如果全班鉴定不了，就拿到全年级，甚至全校去鉴定！

晚上，小组鉴定重新开始，地点由教室改到系办公室；人员，增加了原本不是这组的班长和系团总支书记。我这时想得很简单：现在只要毕业分配工作了，能帮助家里缓解一点经济压力，今天的委屈，日后总有弄清楚的时候。我终于把自己在大二下农村劳动时，看见农民拿着一小罐红苕翻山越岭地跑到公共食堂来蒸，产生了对公共食堂的优越性的怀疑写到自我鉴定中，并违心地上纲上线进行了自我批判。当然，后果是可以想象的。有的说：“既然你反对公共食堂，那就是反对人民公社！”有的说：“既然你反对人民公社，那你肯定反对三面红旗！”有的说：“那你肯定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啰！”我被围攻得无言以对。

而这时，全班三个小组，每个小组都至少有一个同学被重点组织围攻，鉴定的气氛相当紧张。几天后，系上搞的组织鉴定拿到寝室里来让人签字认可。我的组织鉴定结论是“在政治上犯了错误”。当然，各组鉴定出来，“犯政治错误”的不只我一个人，三个组都有人被重点批判，然后定性为犯政治错误。而在鉴定上被抹黑的同学，只有个别人知道，其本人是在两年后的文革中被学生批斗时，才知道自己的毕业鉴定被装了黑材料。当时我缺乏生活经验，完全想不到所谓政治错误的严重后果，我只盼望早点毕业分配离开这令人留恋也使人伤心的美丽的西南师范学院去参加工作，去证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无辜，当然也是无知的。

分配方案终于宣布了，我被分配到重庆市，而罗少云同学则被分到陕南安康紫阳大山中一所中学教书。

2010年5月14至18日，西师大中文系64级第四次同学会在绵阳举办。我在会上意外碰见同班同学Y。当年毕业鉴定时，他是第二小组被围斗的重点人头。这次在会外闲谈中，他说他这个府南河边长大的成都人，大学毕业鉴定说他“与党有明显的对立情绪”而被分到泸州。他是流着眼泪离开学校的。经过多年的奋斗，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泸州长江电力学校从事学生工作。

参加同学会的罗少云的女友H同学，她在绵阳同学会结束以后，同我们几个同学一道前往广元剑门关一游。回到成都后，她写了一篇对大学生生活往事的深情的回忆，全文如下：

## 剑门哀思

剑门天下雄，心向往久之。五月，大学同窗绵阳聚会后，同班的峰、良和我马不停蹄地直奔剑门关。当晚宿在剑门关下。

暮云合璧，远望群山，山色朦胧，淅淅沥沥的夜雨中，总觉有一双眼睛从山林中眺望我，那是英年死于非命的大学同学云，他是剑门关下的剑阁人。

几年前，山在八月盛夏冒着酷暑来成都探望我，这是我们大学毕业阔别四十余年后的第一次重逢。按事先约定，我在家尖着耳朵等着敲门。终于有人敲门了，门开处，一个体形较胖的陌生人立在面前，然后蹒跚进屋。这是山吗？我注意到来人腿脚不灵便，颇为讶异。大学时的山皮肤白净，眉清目秀，身材修长，十足的白面书生。他笑了，一开口说话，那声音，那神情，没错，就是山。我忽然想到唐人诗句：“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岁月这把雕刀啊！一时间喜和悲都涌上心头。

一杯清茶，聊起了大学生活。山提到云，云因为在六十年代我们大学同学办的《艺园》壁报上写了首



《秋风辞》而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大会小会检查反省，批来批去。一个青年学生虽最终未被公开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但无疑是被打入了另册的，毕业时一个人孤零零地被发配至穷山恶水、极为荒凉闭塞的陕南紫阳大山中教书，其遭遇与封建时代因言获罪被流放者何异？山告诉我，云当年是乘军用直升飞机到紫阳文教科报到的，紫阳文教科在山崖上。我的天！文教科在山崖上！李白《蜀道难》曰：“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其险也若此”，令我不寒而栗。想到云瘦小单薄的身影，我半晌无语。唐代韩愈因上表谏唐宪宗迎佛骨“一封朝奏九重天”，以至于“夕贬潮阳路八千”，很难想象他自京城长安一路舟车劳顿，是何等艰难地跋涉到“鸟言夷面”的南方边远之地潮州的。与古代先贤相比，云居然很“摩登”地“享受”乘坐军用直升飞机前往深山报到，是云的幸还是不幸呢？韩愈被流放潮州心境极为悲凉，我无法确知身材瘦小的云离开花香鸟语的大学校园突然面对“危乎高哉”、“黄鹄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的秦岭险阻是何心情，是否也有韩愈那样的“云横秦岭家何在？”、“好收吾骨瘴江边”的悲戚呢？及至云文革期间以未到而立之年却饮弹毙命，又是谁为他收敛其尸骨于汉江边的呢？是他的高堂父母吗？我不敢想象白发人送黑发人痛断肝肠的惨状。山拿出纸笔，问我还记得《秋风辞》么？我念，他记：

**“秋来也，秋风凉，秋风过处遍山黄。几只秋雁南飞度，几尾秋鱼醉寒塘。秋来也，秋风凉，秋风萧萧落木荒。在外游子生离恨，闺中人儿愁断肠……”**

时隔半个世纪之久，我尚能背诵不少诗句，与原作音韵流转自如、朗朗上口不无关系，“几尾秋鱼醉寒塘”的“醉”字也颇传神精当。一个青年学生读了点唐诗宋词，于是“蠢蠢欲动”，牛刀小试地涂鸦，那《艺园》不就是我们大学文科学生习作练笔的园地么？学生毕竟单纯幼稚，只知模仿前人卖弄文才，却不知“文字狱”的厉害。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因为所谓“乌台诗案”被人从诗文中摘出一些字句，断章取义，被捕入狱，受尽折磨，一贬再贬，于花甲之年被流放到极僻远荒凉、人迹罕至的天涯海角琼州（今海南岛），最终送命于谪归路上。

其实对云，又当别论。他仅仅是一个尚在求学的青年学生，仅仅写了一篇练笔习作而已，竟遭此发配厄祸！真是冤哉枉哉！

走在剑门关山道上，抬眼四望，青翠的山林中处处晃动着云的身影，山林哗啦啦地响，是云在诉说么？汉江静静地流淌，是云的悲泪么？剑门雄关高高矗立，是云不屈的脊梁么？

起风了。我看见一股青烟腾空而起，山谷里回旋的大风咆哮着裹挟着云的灵魂直上九天。

“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金刚经·大明咒》）（译：去者，去者，去彼岸者，完全到达彼岸者，唯希有幸。）

2010年5月于剑门关下

我反复阅读《剑门哀思》这篇动情的散文，在脑海里不禁勾起一幕幕往事。

1964年夏，毕业鉴定后学校最后一次放暑假，罗少云同学经成都回剑阁探亲，还去成都我家休息玩耍；返校后毕业分配前夕，我和他在师院大校门毛主席塑像前合影留念；

1964年秋，我在成都收到他的来信，信中附一张他和一位青年教师在陕西安康紫阳三中校园的合影，他们身后是一幢教学楼，教学楼后是巍峨雄伟的秦岭山脉、高不可攀的悬崖峭壁。他在信中说，西安到紫阳他是乘军用直升机前往县文教科报到的。

1967年全国文革武斗中，罗少云同学来信问能否搞到子弹？我告诉他，重庆武斗一起，我就回成都老家躲武斗去了。

当时，罗少云同学已是当地一派的“头头”，正在率众为革命而战，以证明自己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从广元剑阁那边传来关于少云同学的噩耗：武斗中，他被掌权的对立面押赴刑场枪毙了……

多年后，我回到故乡成都，突发奇想：独自前往陕西，探究少云同学大学毕业后的踪迹。我独自乘火车前往陕西安康。当天下午出发，第二天清晨到达安康。下车后，只见车站广场人烟稀少。打听到由安康开往紫阳的火车下午一点过才开，遂乘公交去市中区逛逛。闹市中少见高楼大厦，其城市面貌比成都、重庆至少落后二十年。

由安康到紫阳，火车慢车行驶不到两个小时，只见左边车窗外从大山中流出的汉江水，碧绿碧绿的，保留着千年的原生态。而右边则是连绵群山，火车平均不到一分钟就要钻一个隧洞。紫阳火车站是一个过路小站。出站后爬上一个陡坡，然后乘中巴爬一段公路，说是到了文教科。文教科位于路边一间简易的二楼楼房里，我爬上楼，见一中年男子正在接待一个中年女教师。等女教师下楼后，我开始向他打听情况：

“请问，你们这里有一个叫罗少云的老师吗？他是 64 年西师中文系毕业分来的？”

中年男子惊奇地看了我一眼说：“罗少云？我知道这个人。”

“请问他的家人住在哪儿？”我故意问道。

“他死的时候还没有安家。”中年男子是了解罗少云的人。

“请问紫阳三中离这里多远？”

“三中有茅坝，有八十多公里。”

想着离大山中的紫阳县城还有八十公里山路的茅坝，我望而却步，只好打道回府了。

一路上我都在想，从这位文教科长或干事的年龄看，文革当年他最多是小学生，连他都听说过罗少云的事，可见当年少云同学在全县是多么出名。我想，下次我一定要准备充分些再来！

附：一纸尘封多年的大学同学来信

最近整理书报，翻出一纸少云同学四十多年前从陕西安康紫阳大山中托人带给我和另外一位同学的信。读罢此信，一幕幕往事在烟尘中飘浮……

Y、Z：

你们的来信都收到了，看了你们的信，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你们依然跟往常一样追求真理，上进心很强。而我的来信却显得无力，给人灰心和丧气，我感到很惭愧！

我很想给你们写一封像样的信。但到底写些什么呢？我个人的生活不像你们那样规律，自己也有作一个安排，甚至有时今天是星期几，也说不上来，我很少看书和学习。

但我并不是无事，甚至我还比较地忙。我几乎是全心身地卷进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激流。我前封信给你们说过，我是个 2.1 战士，就因为我们 2.1 派始终处于受压制的状态。最近（即 4.8）又遭对方无联指的大逮捕，4.11 武装部的枪支弹药被抢，我 2.1 派处于白色恐怖之中。这是仇恨，这仇恨激起我心中的怒火，这怒火在胸中燃烧，以至使我不能安静，不顾安危，为了 2.1 派复仇之日的早日到来而战斗着。

以前，我也曾想将我从事的告诉你，但我觉得要说的就太多了，何况我又不善于向人吹嘘我所干的，所以我就干脆不说。

我们现在还在尽力想搞到那个玩意儿，为要对付反革命武装，只有以革命的武装方能见效。这倒不是要去犯杀人的罪，但至少要保住自己不被人杀。令人焦心的是根本无从弄到。

我本来不想提及此事，不过说说可使你们想象我们当前的情势和从事的艰巨事业。也可使你知道我的生活并不全是空虚和暮气。

你俩在信中谈到都有一个女伴了，这是应该的，是好事，我向你们祝贺。我依然如故，不过，我从不因此而焦心。只要她的生活中充满了爱情，那就是幸福。你们说是吗？

当前，安康和紫阳都打得很厉害，邮政大都不通。有一同志因路过四川，故托他带交这封信来，还是没有说出个名堂！

祝好！

少云 四月十六日

罗少云是剑阁人，这次我们年级在绵阳开同学会，会后我和几个同学去广元剑阁旅游，抚摸着剑门翠云廊经历了千百年来风霜雨雪的苍松翠柏，我终于明白了少云爱松写松的深意了。

陶渊明《挽歌》云：《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他人亦已歌？不，对于在苦难年月里遭受政治迫害最终死于非命的我的大学同窗罗少云，这么多年来我何曾忘记过他的音容笑貌呢？死者长已矣，生者长相忆。少云同学，时隔半个世纪之后我们终于到你故乡来看你来了，也许你已魂归故里了吧？天堂里的云，你过得还好吗？

## 忆“右派”难友、杂文家李石锋

曾国一

李石锋比我年长十五岁，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便和我八叔曾也鲁开始交往。和我算是忘年交吧。我出生的前一年（1930年），十四岁的李石锋只身一人从自贡到北平就读于文治中学。一九三二年李石锋和刘盛亚、张天授三人在北平一起合办了文艺旬刊《菡萏》和蓓蕾出版社，先后在北平出版了黄现璠的《宋代太学生运动》、英国大仲马的《金钱问题》、冲突的《徊》等，此时李石锋尚不足十六岁。

一九三四年。快十八岁的李石锋考入北平国民学院文学系。次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北平各大学中学同学在师范大学大操场集合召开抗日大会。会场被军警包围，便衣队持大棒冲入校园，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大打出手……会场大乱，许多学生被打得遍体鳞伤。李石锋和同学李恭貽奋不顾身把两个被打昏在地的同学背起来送到了北平医院急救……

他积极投入运动的同时，开始以投枪、匕首般的杂文来投入战斗。在北平著名的《益世报》、《北平新报》等报刊上发表了《爱国罪》、《罪恶》、《大学教授和文化走私》等有影响的杂文。不久被《益世报》主编看中，聘请李石锋担任《益世报》副刊编辑。从此，不到十九岁的李石锋踏上了战斗、挣扎、多灾多难的杂文家生涯。

李石锋出生于书香门第，富贵人家，是富商兼律师李敬修的独子，李敬修有一族兄名李宗吾。饱学之士，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曾著有《厚黑学》问世，自封“厚黑教主”。近来被认为是近代中国十大奇学之一。还成立了“李宗吾学术思想研讨会”。当然也有人认为并不入学术之行列。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长沙经魏猛克介绍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立即加入以臧克家为团长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团，李石锋担任组长，曹禺为副组长，去到了抗日战争前线河南潢川作战地宣传鼓动（战区司令是李宗仁）。他写了《旅途杂记》发表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

李石锋于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二岁）经王志先（建国后担任过四川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受自贡市中心市委的指示组建了自贡市抗敌歌咏话剧团，担任团长，创建了中共自贡市中心市委的报纸——《正确日报》并担任社长，并被市委指定为支部书记。

抗日战争期间，李石锋在中共南方局主办的重庆《新华日报》，茅盾、巴金主编的《烽火》，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夏衍、聂绀弩、秦似主编的《野草》，老舍主编的《蜀道》、《抗战文艺》，夏衍主编的《救亡日报》，聂绀弩主编的《力报》、《笔阵》，陈白尘主编的《华西晚报》，毛一波主编的《川中晨报》等著名报刊上发表了杂文三百多篇，逾百万字，其中不少精品，影响很大。在北平、在桂林、在重庆都因杂文的锋利的战斗性触怒了当局而遭到警告、追究、追杀、被抓入狱……在

重庆时，蒋委员长对《中央日报》、《扫荡报》这些只看大标题，而对于《新华日报》却看得仔细，李石锋是《新华日报》的杂文栏的撰稿人，因之这个李石锋的名字，老蒋也看熟了。一天，陈布雷拿了五个“经济专员”的任命名单呈蒋委员长亲批。老蒋一看。此中有一个李石锋，蒋委员长把陈布雷叫来斥问：这个李石锋，经常在报上写文章骂我们，这怎么回事啊？经陈布雷一查，原来呈报作经济专员之李石锋乃湖南人，写杂文这李石锋乃四川人。于是李石锋遭特务追杀，连夜逃离重庆。

李石锋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期间。与茅盾、巴金、夏衍、曹禺、臧克家等多有交往，特别与老舍、聂绀弩情谊深厚。

一九四一年，李石锋和老舍住在重庆白象街。冯玉祥将军花甲之寿。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特意在枇杷山曾子唯的异撰山庄（当时是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里面为冯玉祥举办了祝寿会。冯玉祥不喝酒，祝寿会经费也不宽裕，便不设酒宴，以茶代酒。然而此祝寿会却又别出心裁。会上发给了与会者每人一张斗方雪白宣纸。与会者都是爱国抗战的文艺界人士，对于这位爱国抗战将军多有敬仰。因此请每位无论以诗、以画来为冯玉祥花甲之寿表示祝贺。李石锋和老舍同坐一桌。各人都写了一首七律，李石锋的诗是：

### 贺冯玉祥将军花甲之寿

甲子重开不老翁  
将军塞上扫胡风  
悲戈起自亲人怨  
叹剑无由贯日穷  
千章草木青犹在  
万里山河不尽同  
铁板铜琶歌易也  
大家同唱满江红

两人都把自己的诗相互交换。老舍看过了李石锋的诗轻声说道：“有一字可以推敲。”李石锋知道老舍古诗词功底深厚，且为人直率。便轻声诚恳地说道：“舒兄赐教。”老舍用手指头蘸了一点水，在桌子上写了一个“水”字。李石锋说：“太好了，老兄这一改，生色不少，”于是把诗中“铁板铜琶歌易也”一句中的“也”字圈掉了，改为了“水”字，成了“铁板铜琶歌易水”。冯玉祥以后把这次会上为他祝寿的诗和画，裱糊装订成册，视为珍品珍藏起来。

李石锋和郭沫若交往始于一九四零年中国第一个“诗人节”，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主编的《新华日报》上特为这中国第一个“诗人节”出一期纪念专刊。专刊首篇是郭沫若写的《蒲剑 龙船 鲤帜》，次篇是李石锋写的杂文《从咚咚……说到屈原》，另外还有柳倩写的《纪念与任务》，和山写的《关于离骚》，还有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的名义写的《诗人节缘起》等等。郭沫若当时正在主持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正在筹办综合性月刊《中原》。郭沫若任主编，聘请李石锋、柳倩为副主编。以后因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无理干预，郭沫若强硬抵制而夭折。

1950年郭沫若把李石锋推荐给邵子南到西南文联创作部作副部长。

1951年李石锋回自贡市体验生活，准备写长篇小说……不久，他的命运不知怎么就发生了变化。

1952年他被调到自贡市第二中学（蜀光中学）教语文。据当年学生龚和中的回忆。李石锋知识渊博，风趣、幽默，但以往的投枪、匕首般的杂文的讽刺已经“藏而不露”。对于世道时弊的谴责暗藏于风趣、幽默的含蓄之间。自贡市的方言称之为“杌儿”（用ruier连接成一个长音）。所以颇受同学的欢迎。

1953年他又调到自贡市第四中学（广华中学）教语文。

1957年大鸣大放之际，全部中学教师集中在自贡二中，李石锋大鸣大放之际提出了一些帮助党“整风”的意见。最后被归结为“反党八论”。什么“棒糖论”、“桥板论”……从而被打成“极右分子”，

并被“抹光一切”，下放农村，充军宁南……最后弄到红旗盐厂，监督劳动改造。每个月由市委统战部发给一十五元生活费，吊命……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红旗盐厂被挂铁丝吊牌、罚跪、斗争，把他的杂文、长篇……全部手稿当着他的面一一焚毁，而且他被打断了右腿，从此人称“李跛子”。成为了现代的“孔乙己”。

腿被打断了以后，不能干苦力活了，但也不能让你闲着。新的差事是管理澡堂。每天上午没事，于是便托故看病、抓药，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来到光大街我那个小店，数年如一日，风雨无阻，我在那裁案旁边特意摆放了一根长板凳，那是专门为李跛子安排的座位，每天上午十至十一点，他基本上按时入座。李跛子一来便坐在那长板凳上面，看风景，叭嗒叶子烟，和我天南地北吹牛。这些年“李跛子”已经习惯于“寅吃卯粮”，无可奈何之举，否则就无法吊命。每个月十五号，领到了统战部发的那十五块吊命钱，领着了马上还债。很讲信用。还债之后也就只剩得下几块钱了。所以过不了几天又必须借债，如此“恶性循环”。实在无可奈何也！借又不能借多，一次三、五几块，我那里已经熟悉了，向人们拉扯一下没有问题，所以这也是李跛子必须常来常往的另一原因。当然最主要的是能够来此排遣孤独，和我推心置腹随心所欲地神聊。那年月，右派分子都已经学会了三缄其口，已经饱尝了祸从口出带来的无限痛苦，所以都能够装哑巴，整天整天的沉默无言。最多“心诽”而已，谁还敢于“巷议”？本来也就是“不如意事常八九，能与人言无二三”的愁闷。而这种愁闷无言的痛苦非经身受是难以体察的。而今有了如此一个“自由天地”，可以天南地北地神聊，借古讽今也好，抨击时弊也罢，骂江青、骂林彪，随你骂，绝对不耽心如此“巷议”会被出卖告密而遭“弃市”之灾。在重重禁锢牢笼般的现实中，获得了如此舒心的一块“自由天地”，当然就得尽情“享受”。所以每天那一两个小时的神聊已经成为我们生存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1972年秋。右派同学胡俊文从重庆来了一封信，来信中讲：在重庆传闻很广，有关“（72）7”号文件的内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下发的“红头文件”。主要内容是：一、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三种人一律摘去帽子。二、全部恢复工作、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当时，特别是右派分子大多是流落在社会最底层，许多人认为是“无期徒刑”，没有出头之日，很有“心死”的悲哀。收到这信的时候，李跛子正坐在那长板凳上叭嗒叶子烟。我看过信后，把信给了李跛子，他看过信后比我更为兴奋。孟子曰：哀莫大于心死。我这些年来虽“哀”然还不至于“大”，盖由于尚未至于“心死”之故。法国人莫里哀说：“人是活在希望之中！”我的这种希望有如一粒被巨石压迫下的种子。虽被沉埋，然而那希望的稚嫩的芽总无比顽强地在寻找着太阳光……

和李跛子一起“囚”在那红旗盐厂的还有些右派分子。这样一个令人兴奋的“（72）7”号文件，很快一传十、十传百，几乎在自贡市的右派分子当中传遍了。有的右派分子欲知其详，大概也因这个传闻燃起了些许希望，即使还很渺茫然而总是某种希望，希望是能够使人活下去的诱惑！一个个便寻寻觅觅找到了我那个小店来自报家门，进而再打听那“（72）7”的详情。

又是一年，春去秋来，我照样剪布、熬夜，李跛子照样每天风雨无阻前来小店，坐在那长板凳上叭嗒叶子烟，看风景，和我天南地北吹牛，李跛子每天风雨无阻来我那小店坐那么一个多小时，大概使得我们都能够对于各自的郁闷，苦恼，无聊的惆怅能得以几分排遣，所以都已经成了“习惯”。

一天，李跛子告诉我：听说王之南也从北京遣散回自贡市来了。王之南是陈铭枢将军的机要秘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大鸣大放时候，陈铭枢将军的发言稿就是王之南写的。自然，陈铭枢将军“栽”了的时候，王之南也被打成了民革的右派集团中的主要成员……

文革期间，王之南被遣散回自贡市以后，在大安街上一条小巷租了一个八平方米的杳晃栖身。每个月发给十八块钱生活费。年老体衰，生活艰难，好得有个妹妹从武汉每个月寄给他三十块钱，聊可度日。李石锋说：“王之南是我的表哥，还是亲‘血表’，我想去大安见他一面。”当时自贡市公共汽车也很少。李跛子自然没法走着去，而必须乘坐公共汽车，除此之外，当时没有任何其他的交通工具。李跛子说：“我真想见他一面，也就是见一面。当然只能悄悄地见一面。我去呢，这腿脚不灵动，怕

来回时间耽搁久了，引人生疑。另一个办法是把王之南约到你那里，可能他不会下来，这个事……这几天想来想去，还真有点难办，我还想把‘(72)7’号文件的事情给他讲讲。他以前和中央那些头面人物多有交往，看他能不能写信问一问……”我说：“要不这样，我先跑一趟，约好了时间、地点，你们再见一面。”李跛子说：“太好了，你天天这么忙得个不亦乐乎，我真难以启齿。”我说：“反正已经意思到了，听琴听音嘛！”李跛子说：“哎，你真是心有灵犀之人啦……我和王之南好几十年没见过面了，少年时候也是常常抵足而眠、长谈达旦的‘同志加兄弟’呀！”李石锋又说：“听说他不跟任何人来往，其实你们也是亲戚。”我说：“这倒是，二姑父就是大安寨王家的。”李跛子说：“曾鲁他就熟悉得很嘛，听说他一天三顿饭都在大安那家饭店端饭回去吃，肯定跟我一样，自己不会做饭，无可奈何啊！”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第二天我中午之前就赶到了大安街上（洞口井）那家饭店，那是一家很低级的饭店，只卖一些豆花、猪大肠烧白萝卜之类大众菜。此时顾客尚稀少。这类店，一般“打拥堂”都在十二点以后。那是苦力们下班之后一群群蜂拥而至，急急忙忙狼吞虎咽之后又赶快去苦力的干活。那小店里有十来张桌子。在这十二点之前，还稀稀落落没几个人。我瞥见一沓儿里有一个老者正在那里独自用餐。从老人那举止、神态、形象、风度……我判定是王之南。他很可能是专挑这顾客稀少的时间来用餐的。我似随意绕场一周，从他那桌前慢步而过。他正在旁若无人低头慢慢享用桌前的一碗豆花和一碗米饭。我更判定他是王之南。便赶快去买了一碗豆花、三两米饭、四两卤猪肉，端了过去坐在他的对面。他眼也不抬，慢慢吃着。我说：“王老，你好！”他抬眼打量了我一下，没有答话。我说：“李石锋叫我来问候你！”他抬眼又望了望我，依然没答话。我说：“曾鲁是我六伯，我也是右派分子。”他抬眼认真地打量着我，淡淡地露了点苦涩的笑容。轻声说：“谢谢，谢谢你来。”我把卤肉盘子轻轻推过去，礼貌地说：“王老，请用。”他把盘子轻轻推过来，说：“谢谢。”我说：“李石锋要来见你一面。”王之南说：“不要来，不能来！”我说：“数十年生死两茫茫，见一面，难得，无妨。”王之南认真说：“墙有缝，壁有耳，我每个星期还要去给居委会的治保主任回报，周围都盯得很紧！谢谢他。”王之南边说边站起身来，说：“我得走了。谢谢你来。”我说：“李石锋一定要来的。”走了两步，王之南回过头来说：“我住的那里不能去，就这里。小心为好。”

当年那种超级法西斯暴力专制竟使得像王之南这样浪迹天涯的英雄好汉也提心吊胆到了如此地步！可见真如那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克拉克所说的，那居委会的治保委员的震慑力竟赛过了苏联的克格勃，实在是一个完备的细密的超级法西斯的特务系统……

过了两天，李石锋见了王之南一面。

他次日来到我那小店，感慨复唏嘘！“哎！也曾铁马金戈，叱咤风云之人，真有点噤若寒蝉！几分钟。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就见了几分钟……哎！我们这些人虽然也是小心谨慎，但还不至于如此噤若寒蝉呀！年轻时候那种气吞山河的豪情，我看已经被磨练得荡然无存了！”我说：“他有他的想法。你想，从中央，那是最高层，一下子落到了这人间最底层，革命群众的觉悟又是如此的高。红色汪洋大海，难免风声鹤唳……”

李石锋照常来到小店，坐在那长板凳上叭嗒叶子烟，我把胡思敏讲的险恶情况前前后后给他通报了一番。我必须给他通报，他很可能也是“重点监视对象”，相互关照要谨慎小心为好。我还说真佩服王之南老人家，他那么谨慎小心，那么作不是没有道理的！王之南肯定是“重点监视对象”。李跛子说：“我这几天就不出来了，”我说：“又何必那么草木皆兵呢，也不会只是几天的问题，以不变应万变，照样来，无妨。”

李跛子有两天没有出来，第三天来了，坐了一会，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小纸片来，递给我说：“忍了又忍，实在忍不住，还是出来了，今天是我的花甲之日，所以不能不来一趟。这写了首自嘲之诗。赐教赐教！”我说：“岂敢，拜读。”我看过李跛子的自嘲诗，觉得太悲观了。便拿出一张纸写下了一

## 祝李老石锋花甲

石怪磷峒自棱锋

匕首投枪曾逞雄

沉埋不夺补天志

耀目凌空待有时

李石锋看了笑笑，把两首诗仔细地折叠好了放进上衣口袋里面——谁知这一放竟惹下了大祸，简直就是杀身之祸！

十一点已过。李跛子站起身来说：“回去了。”我说：“不行。花甲之寿，岂能如此怠慢。”李跛子说：“和了诗，吹了牛，意思到了，足矣！”我说：“我作东，得庆祝一下。”边说边收拾行头，放入大立柜中，锁好了。李跛子说：“盛情难却啊！”我们便漫步沿着光大街过了新桥，我说：“找一家像样点的饭馆……你选一家吧。”李石锋说：“也好。去鸾凰楼……”又说：“这鸾凰楼于我而言，还颇有些回忆：三十岁那年，本来家里要办三十桌请客，我不想搞这些无谓的应酬，家里人只得作罢。正好你八叔要去就任某军参谋长之职，毛一波要去美国定居，毛一波是《川中晨报》主笔，你八叔是《川中晨报》社长，我在《川中晨报》编副刊《烽火》。我便邀约二位上鸾凰楼为之饯行。毛一波无意中提起是我的生日，你八叔便坚决要作东。真乃光阴似箭！三十岁生日你八叔作东，一转眼六十岁，你来作东，巧！巧啊！”

上得鸾凰楼选一临江的窗户坐下了。窗外可以俯瞰釜溪河，河对岸是富台山，山上郁郁葱葱，青山绿水，还有点“赏心悦目”的情调。既然是祝寿，就把心放宽吧！李石锋说：“一人一碗红烧牛肉面足矣！”我说：“客听主安排，你先坐着。”那时候上饭馆得先去买好了菜牌、饭牌，把那饭牌、菜牌交给服务员，等待着服务员再依顺序一一给你端上桌来。我买好了牌子回来，把一大把八个牌子放在桌子上，李石锋说：“哎呀！太多了嘛！”我说：“不多，一盘韭黄肉丝、二两芭牛肉、一盘豆腐干、一盘花生米、两碗红烧牛肉面、四两烧酒，如此而已！”李石锋说：“太丰盛了！多少钱？本不该问，你知道我有多少年没上过馆子了吗？更不用说这鸾凰楼！”我说：“彼此彼此，但愿你老古稀之寿能够真正的给你庆贺一番……这一起，总共三块钱。”李跛子说：“我俸禄的五分之一啰！”他此时一个月只有十五块钱。

那服务员把豆腐干、花生米、四两烧酒先端来了。我说：“酒、一人二两。”李跛子说：“我还敢喝酒？这左肺穿孔，怕不要命啰！”我说：“跟你祝寿，我喝酒，岂有此理嘛！少喝一点。”李跛子说：“我看着你喝比我自己喝更有滋味！嗨！真的。我来杯白开水。对饮。”我便慢慢地喝酒，四两烧酒于我而言，不在话下。”他便又吹起牛来：“在这鸾凰楼还跟你六伯曾鲁喝过一回酒。一九四零年春，我在广西桂林。那时候桂林是全国抗日文化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抗战文艺最繁荣的地方。夏衍、聂绀弩、秦似主编的《野草》，聂绀弩主编的《力报》副刊，夏衍主编的《救亡日报》，陈残云主编的《广西日报》副刊《漓水》，田汉、欧阳予倩主编的《戏剧春秋》，宋云彬主编的《新道理》，巨赞法师主编的《狮子吼》……都集中在桂林，真有点百花争艳，那时候我主要跟《野草》、《力报》、《救亡日报》写杂文，于是跟聂绀弩的交往越来越多，感情也就越来越深……哎！还出了件当时惊动文坛的大事情。李石锋这些人在不遗余力地鼓吹抗战时，桂林最大的国民大戏院却上演了一部宣扬荒诞色情腐蚀人民意志的名叫《姚凤仙》的平剧，这是当时国民党教育部已经命令禁演的色情戏。是臭名昭著的色情戏《乾隆游江南》的改头换面。地方恶势力和反动当局勾结起来干的。演出很卖座。第一本下来净赚了一万块大洋。便加紧排第二本，更为荒诞色情，预计可以赚到三万大洋。正将上演之前。李石锋写了一篇杂文《耗费》，刊登在聂绀弩主编的《力报》副刊上面，谴责《姚凤仙》是一部以其腐朽的封建的荒诞色情来腐蚀抗日爱国的民众意识。实属对国民意志的耗费……是教育部命令禁演的坏戏的改头换面……放任有害而无益于抗战的坏戏上演是对于国家民族抗日爱国热情的亵渎。杂文一登出。立即引起舆论界的关注，更引起了戏院老板和当局的惊恐。眼见将要赚到手的三万大洋受到威胁，便先下

手为强，雇了一伙打手来到《力报》编辑部，叫交出作者李石锋，又叫交出副刊主编聂绀弩，在编辑部哄闹了一个上午，威胁若不交人决不罢休……下午，李石锋在旅馆接到聂绀弩打来电话，告知严重情况：流氓打手一伙已经追到他住的旅馆来了，叫他立即到夏衍的《救亡日报》社去避一避。李石锋顺手把房门一关，什么也没拿，匆匆离去。刚刚出得旅馆大门，便见几个人横眉勒眼地直向旅馆冲来，幸好这伙人不认识他。他心里明白，坦然漫步与之擦肩而过。一见这伙人冲进了旅馆。李石锋急忙拐进一条小巷，快步向着《救亡日报》社赶去。夏衍正在报社门口焦急等待，看见李石锋平安抵达，热情地把他引进了办公室说：“平安就太好了，聂大哥刚才还来了电话。”聂绀弩是黄埔军校第二期的毕业生，身材高大魁梧，年岁稍长，所以在黄埔军校时候，大家都叫他聂大哥。后来又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后，弃武从文，熟悉的人依然叫他聂大哥。正说着话，聂绀弩又来了电话。夏衍跟聂说：“当然当然，这决不是小事，用武力来威胁舆论，真是岂有此理，当然要抗议！”夏衍又给李石锋说：“先在这里安顿下来，平安第一，我们大家来抗议，一定要进行斗争，正义一定要战胜邪恶！”第二天，杜宣来把李石锋接到《戏剧春秋》社去，因为田汉、欧阳予倩他们那里住地比较宽一点。

恶势力并不至此罢休，派来了更多的人，占据了《力报》编辑部，大吵大闹、威胁谩骂、声言再不交出李石锋或者聂绀弩，就要砸烂报馆、抓走编辑、捣毁排字房……情势十分紧迫。

聂绀弩、夏衍等立即四处奔波，首先聘请了有名的大律师，在《力报》报社大门外贴出大幅公告：“本报聘请大律师某某为报社法律顾问”，以张声势。同时出钱请来警察日夜守卫着排字房。第二天桂林各大报刊：《力报》、《救亡日报》、《广西日报》、《戏剧春秋》……都一致对敌，纷纷刊登谴责、批评、质问的文章。向广西当局呼吁应该主持正义、制止妖风邪气。律师也公开向广西省文教厅进行交涉提出申诉。爱国舆论总动员，加上各种合法斗争的配合，正义的力量形成了相当的威力，在当时的桂林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广西省文教厅只得命令“禁止演出平剧《姚凤仙》”。正义战胜了邪恶。为此，夏衍在一九四零年六月九日《救亡日报》副刊《文化岗位》上写了《岗语》：《批评与打手》。以之来庆祝和纪念这一正义战胜邪恶的斗争胜利。李石锋在当时亦因此而名噪一时。然而，恶势力却难消怨恨，花了几千块大洋排好的戏被一篇文章绞杀了，怒气难平，便雇佣了杀手要“黑办”李石锋。聂绀弩只得筹集路费叫李石锋赶快离开桂林去重庆，又说：“恐怕我也得离开这里，到重庆来……”

李石锋说：“我到了重庆不久，聂绀弩也来重庆了，我们在重庆呆了几年……后来我在重庆被特务追杀又逃回了自贡市。后来，聂绀弩在重庆也呆不下去了，想去香港，没有路费，便到自贡来找我筹集路费。我为聂绀弩筹集了一百块大洋，聂绀弩正准备启程去香港，我们就到这鸾凤楼上来为之饯行。走到正街，迎面来了一人。高大魁梧、昂首阔步。聂绀弩一见，急忙上前，两人热情地寒暄，握手，一个直叫聂大哥、一个直叫老弟，把我冷在了一旁。我打量这人浓眉大眼，一脸英武之气，面生而又似曾相识。聂绀弩介绍说：‘这是曾鲁，曾将军。’曾鲁说：‘哎，聂大哥！不必这么叫嘛。’聂绀弩又介绍说：‘这是李石锋。’曾鲁说：‘知道，李敬修老伯的独生公子。’我说：‘也鲁兄和我很熟，曾将军未曾见过面。’曾鲁说：‘不能这么叫嘛，世兄嘛，叫我六哥好了。一起到寒舍小聚嘛。’聂绀弩说：‘我们约好了去鸾凤楼，老弟也赏光吧。’曾鲁说：‘好啊。’他身后还有两个副官，曾鲁打发他们回去了，我们就一起上了这鸾凤楼。聂绀弩和曾鲁是黄埔军校二期的同学。两人颇多怀念，又把我冷在了一边……酒喝得不少。三瓶茅台三瓶花雕，当然都是些高档菜肴。花了好几块大洋……聂绀弩‘鸣放期间’也被打成了右派，而今自然是生死两茫茫！……”

很多年以后得知，聂绀弩也是被弄到了北大荒去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时候甚至被判了死缓……年已花甲将近，依然去干推磨，挑水之类苦力的干活。

第二天，十点过，我正在小店里，忽然看见大街上几个人拉着一辆架架车飞跑着喝着喊着向前奔跑。那年月没有“急救车”之类，一看见这种阵势，就知道是有危重病人，大家都让路。我听见有人向小店这边喊：“老曾！老曾！……李石锋不行了……”我接连来了几个顾客，一时没法脱身。忙碌过了，



刚想坐着歇歇，却看见戴培树呆在一旁。他是和李石锋一起“囚”在红旗盐厂，被监督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以前是公安部门的，被“囚”在一起的还有好几个。我说：“老戴，李石锋怎么了？”戴培树说：“大吐血，正在抢救。今天医院里来了四个大吐血的，李石锋年纪最大，只有他年过花甲。吐的最厉害，真吓人，他一吐，要喷几丈远，墙上、屋顶上、窗户外面都喷上去了。医生、护士都说，没看见过吐得这么厉害的病人。我说：“止没止住？”戴培树说：“没有啊！一阵一阵的吐。”我说：“有多少血来吐呢？怎么办呢？”戴培树说：“医生说李石锋是最恼火的一个，凶多吉少，四个里头第一个完蛋的必定是他。李石锋叫我来找你借五块钱，去买一支红参，他说只有嚼红参才稳得住。”我说：“我和你一起去吧。”正说着又来了几个顾客，戴培树说：“他正在抢救，你忙过了再去吧。”我便拿出了十块钱，交给戴培树，说：“先拿去给他用吧，用完了再来，我这里找人拉扯一下没问题。”戴培树说：“跟你借的钱我会记数，万一死了，我会作证。”我说：“哎呀！几个钱啰！不必，不必，但愿能躲得过这一劫啊！”戴培树说：“吐血住院这是第六回了，这回最厉害，看他的命啰！命中注定三更死，不会留你到五更。”我说：“劳烦你了，但愿能够躲得过这一劫。”

晚上下班以后，匆匆地胡乱吃了点东西，我便赶到了医院住院部。李石锋已经昏迷不醒，还剩下他一人住在那间抢救室里。室里灯光昏暗，医院里特有的药味，不通风，空气稀薄，死气沉沉，压抑得使人窒息。我在抢救室里呆了好一会，看见李石锋真已气息奄奄，处于昏迷状态，将死而尚未死，根本不知道我来了。戴培树把我叫了出去，我说索性到外面树荫下面去说，这病房里空气太糟糕了。戴培树说：“今天一起抢救的四个，黄医生说第一个死的该是李石锋，因为李石锋年级最大、体质最弱。其他的那三个都更年轻、体质也更好，而且给那三个都输了血。其中有一个是文革头头，给他输了好几千毫升血，还是死了，其他那三个都死了，你来以前死了一个，刚刚才收拾停当……偏偏还剩下个李石锋没有死。黄医生说，肯定是死定了。所以对李石锋已经停了药了。黄医生已经交待了，等会死了就把尸体抬到停尸房去。”我说：“人还活着，怎么就停药呢？为什么不给李石锋输血呢？”戴培树说：“这个医生是革委会的，他知道李石锋是个右派分子，本来李石锋最应该输血，黄医生说的，不能给右派分子输血。以前每次住院，从来没有给他输过一次血。”我说：“他妈的，什么救死扶伤？什么革命人道主义？真他妈的草菅人命！……这，这，这怎么办呢？”戴培树说：“恐怕没有任何办法啰！药已经停了，等于已经判了死刑了！一切都放弃了，只等着他死！！”无可奈何！实在是无可奈何！！

医乃仁术也！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高尚的道德理念就这样被“革命”毁予一旦！

李石锋啊，你也曾驰骋文坛，也曾叱咤风云，竟落得如此一个下场！李石锋啊，你多次遭特务追杀未死！被抓进监狱未死！而今却不可逃脱这样一种不明不白的死，你的冤魂能瞑目于九泉吗？

我和戴培树走进抢救室，待一会又走出来，进进出出、焦头烂额、无计可施，没有医生，护士不能作主，我们完全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地等待着，等待李石锋落掉那一口气，好把他抬进停尸房里去……而李石锋又迟迟落不下那一口气，我们又丝毫无能为力去为他有所作为，那种焦急难安、那种束手无策、那种无望的等待。真叫人心急如焚！即使是医院这样应该充满人性、人道的地域。那超级法西斯的反人性、反人道的威力也杀气腾腾。“教育”出来的医生可以成为刽子手！

已经深夜十二点过了。我和戴培树站在病房外面，阴风习习、寒气袭人。见一个人向着病房走了来，那人认出了我，招呼我说：“哎，曾师傅，有病人啦？”我一时没认出他来，心急如焚，便随便应答了一声。见那人向病房走进去了。戴培树说：“你认识他？”我说：“一时想不起来，有点面熟，可能是来找我做过衣服的。”戴培树说：“赵医生啦！来值夜班的医生。”我说：“真的？对、对、姓赵，是来找我做过衣服的，那我得去找找他！”戴培树说：“恐怕找也没有用。”我说：“不行，一定得找！”我敲了敲门，赵医生正穿上了白大褂，说声：“进来。”我说：“赵医生，你好，要麻烦你。”赵医生说：“你讲，什么事。”我说：“二十六床李石锋，人还活着，怎么就停药了呢？”赵医生站起身来，拿出了二十六床的病历。翻了翻。拿起听诊器就向外走，我说：“人还在抢救室……”

赵医生来到了抢救室，开了灯，听了听心脏，摸了摸脉搏，便急步向值班室走了回去。我说：“你可得救救他啊！”赵医生点了点头说：“你们在外面等。”赵医生叫来了值班的护士，关上门，里面声音时大时小，似乎有分歧、有争执……我和戴培树提心吊胆地等候在那外面。

抢救很快开始了。强心针、输血、输药……夜间人手少，赵医生帮着护士忙碌了好一阵子。忙完了，赵医生说：“你们要拿一个人盯住，有情况，马上来叫我。”我说：“实在太感谢二位了。”赵医生说：“毛主席说，救死扶伤，革命人道主义嘛！”我说：“是啊！医乃仁术也！”这些话似乎是说给那个护士听的。这个赵医生，从大学出来不久，年轻、血气方刚、还有点正义感。哎！也真是幸运，真是偶然、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差那么一点点时辰，可能李石锋就去那“枉死城”报到去了。

我和戴培树又走到病房外面树下。戴培树说：“有个重要情况应该跟你讲。昨天李跛子回来把衣服换给人家拿去洗（衣服给人洗，每个月一块五角钱），洗衣服的人在把衣服丢下水之前照例翻了翻他的口袋，把他口袋里翻出来的两张纸条给他送回来。那洗衣服的人又不识字。李跛子不在，那人就把纸条随便给了一个人，叫他转交给李跛子。殊不知这家伙是上面安排来专门监视右派分子的。是不是该李石锋倒霉，那人一看纸条，就拿上去汇报。上头革委会的看了说这是反动诗，所以今天上午弄了十多个人开李跛子的斗争会，叫他交待。有人说李跛子天天到你那里去，是不是搞什么阴谋活动，追问这首诗是不是你写的，李跛子不回答，一个姓张的右派想表现积极，上去就给李跛子一拳，正正打在李跛子左肺穿孔那里，当时就喷了一大口血……”

夜间两点过，经过抢救和输血，李石锋奇迹般地甦醒过来了。看见我在旁边，有气无力地淡淡笑了笑。戴培树近前低声在他耳旁慢慢说，大概说我去找了赵医生，所以进行了抢救、输血之类。李石锋示意要跟我说点什么，我走近前去，李石锋声音很微弱：“住了……六回……医院，这是……第一回……输血……阎王不要了……”

李石锋有五子、三女。他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和他爱人万咏非双方“自愿”离婚。儿女全都跟了妈。也就不认李石锋这个老子了。当时是不敢认。叫作“划清界限”。我那小店声名远播之后。李石锋的前夫人，以及三、四、五、六都成了小店的老顾主，常常前来光顾，不免和李石锋邂逅相遇。特别是老四，从此每个月都要买点糖果之类去李石锋住的那个窝探望一番。在那个年月堪称尚能一尽人子之道了。哎！李石锋住的那个窝，真比乞丐住的还不如。他出院之后，我去看望过他。他本来和十多个工人住在一间大房间里。出院之后，对于这肺结核大家都心存恐惧。李石锋也说：“我这肺病，肺穿孔，正是开放期，有传染性。但又无处可搬。”这个难题这些工人当然无法解决。李石锋其实早已经有所盘算。便试探着说：“厕所旁边那间猪圈，现在也不喂猪了，打扫打扫，我搬到那里去住，免得把这肺结核传染给大家，行不行呢？”十多个工人认为李石锋如此的高姿态自我牺牲，当然求之不得，但那是猪圈啊！而且多年不用不管。顶也漏了，墙是仿古式的泥筑的，塌了一角，觉得把李石锋撵到那么一个角落似乎也有点于心不忍。李石锋坚持要去，那些工人也就求之不得了，几个工人在那以前猪睡觉的石板上摊了几张木板，再加上稻草铺了算是床，用几块石头胡乱砌了个堆，聊作“写字台”。因为李石锋“恶习难改”，要偷偷写点东西。其他还有一个炉子，他自己不会煮饭只偶尔烧一烧。此外便无有他物了。

我去的时候，满屋潮湿霉臭味。旁边厕所的臭味还不时袭来。我说：“怎么搬到这么个地方来了啊！？”李石锋说：“图个清静。没有监视的耳目。清闲！躲进小‘陋’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我说：“这陋室也太陋了嘛！”李石锋说：“所以，没有任何人来打扰，那个监视的人连这道门他都不敢进来，牛棚、猪圈同样的可以乐在其中。”我打量着这个比我那个窝还要低几个层次的角落，真是比叫化儿（乞丐）住的地方还低几个层次。李石锋的老子，富商兼律师李敬修，以前在自贡市中区修建了一座城堡式的豪宅，其规模之大，解放以后曾经作为自贡日报和新华印刷厂共有的所在地。如此一个豪宅和眼前这么个猪圈相较。真令人惨不忍睹。在这间猪圈里，李石锋一直住到“落实政策”才离开。

李石锋最后被安排到自贡市第十中学去教语文。但他一天课也没去上。年过花甲，中气不足，办了退休（叫他的五女儿去办了个“顶替”）。他去的时候给他定的二十三级，比我还低了三级。月工资只有四十多元，办了退休以后更少了，还不到四十块钱，难以维持，于是重操旧业，拿起笔杆，想以卖文来添补。文章不值钱啊！三十块钱一千字，一篇杂文也不过千把字。几年间他先后在《人民日报》副刊《大地》等等刊物上面发表了几十篇。退休之后身体很不好，收入太少，但勉力支撑，整理了以前写的杂文，辑成了两个集子，当时出这类归入“严肃文学”的书籍得自己掏钱，或者包销之类。自己吃饭都艰难，哪来这笔巨资？集子放在出版社，等待着机会。退休之后没有几年又得了个喉癌。没有拖多久，去世了，终年六十六岁。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过一个集子，已经无存，生前整理的两个集子，没钱去出版，故交们有些过意不去，侨居美国的毛一波寄来了一些钱，故交们集了些资，勉力为李石锋出了一本很薄很薄的纪念文集，其中选了李石锋的一些杂文。

李石锋去世后，自贡市文联、作协、学校和一些故交在火葬场开了个追悼会。我去了，和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曹和生，以及罗成基、孙遐龄、金闻达……参加了追悼会。何青（原右派分子，这时是自贡市文联主任）主持开会。四川省作家协会等等来有唁电。虽有赞誉之词，然大半生却是在苦难之中挣扎过来的……

戊子年 盛夏 于酸芭斋

（摘自长篇纪实文学《末代贵族追思录》系列之三：《我的右派生涯》）。■

## 重庆市大学生“右派言论”摘选

江畔愚公 辑录

**按：**在“反右派”运动中，重庆各高校将大批青年学生打成了“右派分子”，许多人被送去劳改、劳教，有的因拒不认罪而被升级打成“现行反革命”……他们的青春，他们的家庭，以至他们的一生，都毁于这场旷古未闻的“阳谋”。发明这一“阳谋”的毛泽东，在他们这样的年龄时曾自由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而这些“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大学生当年到底说了些什么话会遭此大难？重读下面选辑的这些所谓“右派言论”就会明白，原来他们不过是说了一些真话，坚持的是一些常识。“言者无罪”竟变成了“说真话有罪”！毛泽东有过不少要求别人忠诚老实的语录，在他执政初期还搞过一场大规模的“忠诚老实运动”，然而，经过“反右派”运动，人们才恍然大悟，真正忠诚老实的人，在毛泽东时代决没有好下场。于是，紧接着“反右派”运动，就轰轰烈烈地掀起了一场上上下下都比赛说假话，导致赤地千里、饿殍遍地的“大跃进”……

以下内容摘自原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1957年8月编印的《重庆市右派言论选辑》第一集。

### 曾清经

男，西南师范学院化学系学生，被打成西师“罗（罗容梓）董（董时光）右派集团成员。

毛主席和党中央首长们：作为国家领导人，我是很敬佩你们的。去年孙中山诞生90周年，共产党举行了扩大纪念会，纪念久已被人忘记的革命领导者。孙中山的思想复甦，孙中山的革命是正确的，他的理论是现实的，他创立的国民党——革命政党（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是民主党之一，不是反动党，孙中山的思想不是反动思想，他的著作流行。口头上的纪念哟！他的党，他的事业在进行，他的大同思想老实说社会主义实现也不能包括其全部。但是他的党被一棍子打杀，现在只有台湾有，大陆没有，由于国共分裂，两党斗争，它被挤到反动的一面去了（反革命了）。国民党在大陆上遍及全国各地的机构被毁了，其中大部分基层党员没有组织了，共（原编者按：指共产党，下同）一来就仇恨这个组织，信仰三民主义者，参加了的被登记了，不准恢复其组织，不准其活动，使这些人政治地位丧失，

政治生命断送。……

口头上纪念不算事。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在台湾存在着，大陆上党员应恢复其组织，为了台（原编者按：指台湾）与大陆一致。中国的领土台湾，不是共产党中国的领土台湾。台湾国民党不是投降共产党，败于共产党，台湾国民党脱离美帝国主义怀抱，登上大陆来达到国共第三次合作。

为表示共产党有诚意，允许两党竞争，允许国（民）军政人员爱国。我建议：把反动国民党头衔划去，战犯头衔划去。因为，他们彻底反动吗？硬是卖国到底吗？国（原编者按：国民党）是共发动群众或与群众一道赶到台湾的。现在由共发动群众或与群众一道欢迎回来，承认国政治上进步、民主，恢复大陆组织，让信仰三民主义者有组织，不蔑视为反动党派，让其站到中国人民中应有的地位，监督共产党，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再说他们一些人是有血性的，为党为国忠诚老实的。我们今天也在讲忠于党、忠于人民以及忠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难道忠诚该杀吗？孙中山思想应该覆灭吗？……我建议国党由台移北京，人员全回国。

……

口头上纪念孙中山，不正是和国民党口头上读总理遗嘱一样吗？各民主党派已经提出他们组织不发展、让老死，死就算，我说共产党振（整）什么风，是在宣扬一党独揽大政的功劳。我认为国党上陆，两党竞争，则一些党员，自不腐败矣。

现在党明白过来，要除三害，扩大民主，我很钦佩，但是作得迟了，台湾问题恐怕是最头痛的问题。要想解决，我认为国民党是一个求上进，找出路的党，在大陆上有其信仰三民主义者，有小资产阶级阵地，有非党，让他们来选择他们所希望的党……

——西师化学系整理的鸣放言论发言记录

## 朱永隆

男，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被打成西师罗（罗容梓）、董（董时光）右派集团成员。

大批大批党员不成其为党员，党已经变了质。

目前，人们还存在着这种看法，党是绝对正确的，它的党员犯了错误，而党却一点错误也没有，于是党就成为万能的东西和绝对正确的“东西”了。现在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材料揭露出来了，证明了大批大批的党员已经不成其为党员了，请问整党是整全党呢？还是整个别党员？党的大多数党员变了质，难道那个党还没有变质么？统购统销明明存在着严重的错误，统购数字过大事实上是从上到下摊派给群众负担的。这种种错误与党中央真是无关么？否！同志们，例不多举。总而言之我们不能简单的接受一种传统的看法：党是正确的。

现在用不着“盲目”崇拜党

党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离开党员的党是一个空洞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它不能抽象而且全能，现在我们用不着盲目崇拜党，虽然党有很多政策是英明的、正确的，然而这一切也丝毫不能把党进行“神化”和“抽象化”。抽象化了的，神化了的“党”，不可捉摸的东西——党——成为全能的上帝。

过去把神叫“上帝”，现在叫做“党”

过去的时代，上帝是一切，现在的时代，党就是一切，它们同样是神，过去叫做“上帝”，现在叫做“党”，我们可以说，党加以神化、抽象化和绝对化的同时，等于是叫人们信仰一种新的宗教了。

——《抽象化的党——“上帝”》，原载西师第三教学大楼张贴的大字报

我感到没有谁会反对共产党。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对的，但有部分“三害”是和党本身有关，有人说共产党成绩大。缺点是个别的，这是神化了共产党，变相的个人崇拜，我们要集中火力反对把党加以神秘化：党有错就应该反对。

党员的错误与党中央有关：如“速成识字法”只“速”不“成”，统购统销的错误，只党中央摊派数字，只强调下级完成任务。因此，这不是反对个别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者，这是党速成的，和党

本身有关。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都有人提意见。

“三反”“五反”有比较严重的错误，冤枉了很多，如涪陵师范冤杀了人民，既是人民为什么要斗杀呢？

——在文科论坛的发言

## 谭家驹

男，西南师范学院生物系学生，西师鸣放期出现的油印报“平民报”负责人。

一般没喊共产党万岁的科学家承认是科学家，喊了共产党万岁的科学家是伟大的科学家(加了个伟大的)如李森科就是伟大的科学家。然而米丘林学说在苏联造成了农业的损失而孟德尔学说却在美国获得了成就。

政治信仰是自由的，然而西师为马列主义统治着。我建议图书馆应该贴各种报纸、不管台湾的、香港的报都该让大家看。

根据宪法人民有思想自由，因之党团员只能汇报党团员不能汇报群众情况。

共产党不承认错误，说成绩是主要的，然而三反中方尽逼死人，肃反中错杀人，说何剑熏是反革命分子，这些错误难道不是主要的吗？因之我认为成绩是主要的，但错误也是主要的。

——《没落的中国共产党》，原载“橄榄报”二期

## 微言

西南师范学院学生。原编者按中称：“微言是什么人，现在还没有查出来。”如果后来也没有查出来，那可得算“反右”运动史上的奇迹了。

解放后评定工资成绩提出了应当以“德”和“才”为标准，当时我们欢欣鼓舞地拥护这个办法，可是什么是你们所谓“德”和“才”的标准呢？八年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标准就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阿谀拍马歪曲事实来迎合上级心理，打击、诬陷、以别人为垫足石来图自己的升官发财的，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德”，有这种“德”者自然也就有了“才”，这就是你们的逻辑？有良心有正义感的有高尚的道德不肯做这样卑鄙的苟且行为的人就是“不靠拢组织”就是“别有用”，也就是缺了你们所谓“德”，被错指为“有历史问题”，被错认为“三反”有问题，甚至于“成份不好”。甚至于同情了被冤屈的人一下的也是缺“德”，缺“德”者必无“才”，这也是你们的逻辑，规定了这种标准，运用了这种逻辑，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于是，作风恶劣，还赶不上幼儿园程度的党员官太太居然月领人民血汗六十余元，侮辱女同学，人格扫地的党员助教居然让他玷辱大学神圣的讲坛，不辨经纬线的党员居然是地理系的助教（不过这助教本身无罪），油腔滑调的毛头小子一登龙门身价十倍居然左右中文系的行政，居然要老教师看他的眼色行事……反过来看，过去的老教授不让他教课而叫他们去数砖头、管图书，即使让他们教课拿的工资有的还赶不上“官太太”。“三反”“五反”把个老教授整得家破人亡连歉都不道一个。其他被种种帽子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教职工更是有冤无处诉，这些人埋头苦干的工作加薪晋级却总轮不到他们，即使普遍加薪的时候也比人家少得多，有些人因为“三反”的关系降级减薪甚至停发工资达两三年之久，一个厨工在学习会上要求保证休息时间，被罚每两周写检讨一次达十四五次之多。你们运用这种“德”“才”标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你们自以为效忠于党！其实是害了党，今天大家帮助党整风，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者，再不虚心接受，你们的危机就太大了。我们是真正爱祖国、爱人民的人，因此也爱为国为民的共产党，假如你们祸国殃民，陷你们的党于不义，中国共产党就将失去人心，人民就要反对它！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者，何去何从趁早自择吧！

——原载“白丁报”第二期

## 魏福民

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

汇报制度使我大伤脑筋，不得不戒备。断章取义，逻辑推论，汇报上去，有的就倒霉。这是宪法上没有规定的一种制度，他近乎国民党特务的告密、成了收集反动言论的工具，尤其在宗派主义、官

僚主义、主观主义严重的情况下，造成了人民的内部矛盾……党团组织客观上破坏了人与人的真挚感情。我的朋友一入党团后，就从不对我说句真心话，党团组织从我心里抓走了我的朋友，抓走了人的感情……

新中国成立以来，叫作人民民主专政，“联合政府”已成一纸空文；我认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是一党专政；中央各级政府机构组织的负责人，都是共产党员担任。这与联合政府的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不相符合。统一战线也只是装门面，现在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而民主人士那些人有实权？只对民主党派上层知识分子作了生活上的安排，统上不统下，共产党不应该清一色，否则就应该改人民民主专政名字，这样才符合事实。

我对我们的民主很怀疑，我们都是中国公民，为什么没有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在工厂、农村、学校，候选人都由上级指定。党中央提出“长期共存”，当（但）是事实上都是非党员不能当选。党员只有一小撮，在全国内不多，而这样的结果，就变成了党不仅对敌人专政，而且也对某些人民专政。宪法上规定的人身自由，人人平等，但有的地方侵犯了人权……人们没有结社、迁徙的自由，宪法都如此失效，其他法律就更不用说了。

党是一个政治党派，不能以党代政，党委以一个政治党派机构在学校出现，不能领导学校，……党养了一大批工作干部，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用了国家的钱；最高的利益是祖国的利益，有时可以违背党的利益，但不违背祖国的利益。

帝俄时代侵略过我国，占领了我们一些领土，但这些事实苏联的历史家却一字不提，当然也不叫苏联现在还给我们。帝俄占领了黑龙江不还，还说是收复，蒙古独立可能是苏联的离间，与苏联有关。

流沙河的草木篇是生活的真实，对他的批判是围剿，这跟清朝的文字狱一样残酷。

——由西师“群众报”综合整理

## 陈 怡

西南师范学院数学系学生。原编者按中称之为“西师鸣放时期出现的、气焰十分嚣张的右派油印报——白丁报的副社长兼记者采访组组长。”。

对肃反问题的探讨：全国公布有5%的反革命分子，请问：难道全国有三千多万吗？岂不遍及各处吗？怎样没有听说重庆有十多万反革命分子呢？这造成很坏的效果，我院要完成5%的任务，弄得人心惶惶，如坐针毡。变相扣留，侵犯人权……这是违反宪法的行为，我坚决抗议。

——1957年6月5日在数三乙班座谈会上的发言

## 蒲世光

重庆大学冶金系学生，共青团员，22岁。

我不承认学校中有右派分子；如果有的话，则右派分子思想是活跃的、积极的，对事物是敏感的，因而能促进社会进步……。反对右派就是反对了最积极的活跃的因素，这就造成了思想活跃的障碍……共产党过去犯了很多错误，而现在反对右派也是正在犯错误……帮助党整风，现在则是党整群众的风。反驳右派的错误本身就是党的又一大错误。

——由学校整理的右派言论综述，原载重庆大学学习简报24期

## 康 平

重庆大学动力系学生。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究竟有没有民主和自由？我不敢说的太肯定。但是我喜欢民主，喜欢自由。而有些人，在他看来却不大喜欢民主，尤其对自由，简直象讨厌臭狗粪一样。他们把自由和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思想混淆在一起，又把自由和纪律对立起来。这些论调带来甚么样的后果呢？带来了这几年的三大主义弥漫，带来了学术思想的死气沉沉，带来了公式化和概念化对文学艺术的垄断。去年普选，我提出那种方式不大民主，就有人当头给了我一棒，说我要提倡资本主义的竞选。有人说，选举要在实质上求民主，不要在形式上讲究。但是事实证明：没有形式的民主，就没有实质的

民主，去年重大选举，有人说萧远霞不恰当，结果就遭到了压制。在选举投票时，人民变成了机器，只会提起笔来划圈圈。

宪法上提出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自由都没有得到保证。报刊的大权大多掌握在党员的手里，越了轨的文章根本就刊发不出来。要出墙报吗？要集会结社自由吗？就谨防给你按上一个鼓动罪。由于有了宗派主义，产生了党团员的特权思想，有些不纯的分子，看到入党有利可图，便不惜吹牛拍马，攀藤附葛，他们的奋斗目标不是共产主义，而是金钱、美人、地位。难怪有些姑娘找对象形成了三员(党员，技术员，八十元)一长(科长或局长等)之说。

对于苏联给予我们的经济援助，我感谢这种大公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但是我也觉得有一些个别的专家除了带来了一些国际主义以外，也带来了一些沙文主义。我很诚恳的希望把沙文主义丢掉，以便中苏人民团结的更加紧密，更加诚恳。至于，我们国家的一些中下层干部，那种盲目崇拜，生搬硬抬的作风倒是很值得纠正。他们只知道“向苏联学习”这一句，仅把苏联的落后经验也抬过来了，在厂矿中他们签字叫执行；出了问题骂技术人员，叫技术人员负责。技术人员真是倒了霉，被看成饭桶、衣架。我要鸣一下不平，希望尊重一下技术人员，尊重一下知识分子。

——《民主、自由、宗派主义及其它》，原载重庆大学“学习简报”9期

## 林毓森

重庆大学学生，共青团员。

不许别人说，但别人总还要闷在心里，高喊“批判”！“批判”！虽然能使周围再也听不到一点点“不悦耳的声音”，取得全校思想的大“团结”，然而这正是某种程度上的虚伪的思想大团结，这表面上(好象)是维护了党的和社会主义的利益，而实质上，不少人的思想认识，因此不能迅速提高，这确确实实的不利(于)党和社会主义建设，再则，我们既然相信，党是无比坚强的，社会主义是不可动摇的，马列主义是经得起辩驳的！那么，为了暴露同学中的思想问题，“宽”大家无罪，让人家出来说几句不“吉利”的话，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何况我们并不是站在旁让它啊！紧跟着而来的朋友们真诚的思想帮助，必然会以最快速度扫清同学们思想中的一切谬误！这种能以最快速度消灭荒谬的思想的办法，总要比高举“大帽子”大喊大叫地强迫同学们保留着荒谬的思想要好得多吧！由此又得出结论：还是“言者无罪”的好，让大家说出心里的话。

——《同学们站起来反对粗暴的思想工作作风》大字报

## 罗国梁

西南政法学院学生。

有人说合作化高潮中入社是农民自愿要求的，事实上农村中50%以上农民是被迫入社的。如果说国民党是白色恐怖的话，那么我说共产党就是红色恐怖，比如共产党在每个运动前都来捕一批人，杀一批人。有些富裕中农不愿入社，就说不对。有人说农业合作社有三年的优越性，但我说一年都没有。

农民在统购统销后，剩下粮食就很少了，连点灯用油每月才分配三两，而城市有电灯却每月有七两油。农民比工人付出的劳动要多，但生活反不如工人；农民每月只有几元钱的收入，而工人每月却有几十元，甚至几百元。有人说内部矛盾是可以转化的，实际上拿缴公粮来说，政府要好粮，有一个农民由于没有好粮缴，而打了验收员，结果就被枪毙了。枪毙后农民就不敢说什么了。

——《共产党不能代表农民利益，农民应该有自己的政党》大字报

## 陈谦

西南政法学院学生，共青团员。

我工作过的公安派出所，原提拔的一个所长，由于不是党员，结果被撤职去当办事员。民主人士就是当了领导，也是有职无权；国务院总理中一个民主人士也没有。因此我认为不说“清一色”但也可以基本上说是“清一色”。同时党不遵守宪法办事，表现在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在逮捕人犯时要经党委批准，这不是违法乱纪吗？这不是党包办一切吗？

选举是一种形式，实际上是由党委提名，因此人民不能选举出自己最满意的人，所以选举出来的代表不起作用。例如：重庆市罗汉寺选举区选举时，党提出一个和尚为候选人，但人民不愿选他，结果党硬要选他，便做了许多动员工作，坚持选他出来作为装璜，因而个别民主人士，作了领导，也是为了做装璜。

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农民本身并没有入社的要求，但是上级一再动员，农民就这样随大流入了社，根本就不是真心愿意的。毛主席在这问题上(是)主观片面的，他只调查了河北省少数几个地区的情况，就制定了方针、政策往下贯彻，下面就不得不执行。例如西南地区因系山地，不能使用拖拉机，因此不适宜合作化，但毛主席就没有考虑到这一些情况。有些人只能向基层干部提意见，而不敢向中央和毛主席提意见。

——原载西南政法学院战斗报 8 期

## 李永贤

西南政法学院学生。

说甚么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性质改变了，消灭了剥削，其实正相反，而是多数人劳动吃苦，少数人享福嘛。说现在工人和农民生活提高了，我看一〇一厂工人和其它厂的工人，都很苦嘛，穿的烂，吃的也坏，劳动“架势的整”，不少的工人都得了职业病了，对农民统购也太过火了，不但没吃的，并且还没穿的嘛，大人衣服穿烂了改为小人穿，小人衣服烂了，就拿来做尿片……。再说，我们国家里说啥子减少了失业人员，或者将要消灭失业人员，但是我们看见的是失业人员一批又一批的在增加，有不少的人找不到工作干……

——原载西南政法学院院刊 112 期

## 冯光中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学生。

冒死为胡风请命。为什么要“冒死”呢？胡风是被完全否定的一棍子打死的。他是反革命似乎毫无疑问。凡同情胡风、为胡风辩护、对胡风问题抱怀疑态度的人，都有被扣上“胡风分子”“胡风信徒”“受胡风思想毒害”的帽子，而遭到打击，所以要提出“为胡风请命”，必然是冒着很大风险的。所谓“冒死”形容它严重耳！“请命”，请的甚么命呢？那就是要求政府实事求是的在全国人民面前公开审判胡风！把胡风是毒草还是反革命的问题彻底弄清，如果是反革命就应该惩办，如果错了就应当勇敢在全国人民面前公开错误，向胡风道歉，恢复他的名誉。现在就胡风是否是反革命问题我大胆地提出几个疑问理由：

(1) 逮捕了两年之后的胡风，为什么到现在还未作公开的审判？

(2) 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宣传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他只能为这些错误的理论负责。

3. 在学术问题上，在文坛上，是允许各种不同的派别出现的……甚至立场根本相反的学派，他们为自己学派的扩张和自己信仰的理论胜利进行活动是正当的，真理并不害怕任何反驳和攻击，唯物主义理论不就正是在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理论作不懈的斗争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吗？……

4. 世界上不会有这样一个愚蠢的反革命分子，以三十万字上书来颠覆革命政权，诚然这三十万字上书的基本思想是错的，它想以胡风文艺思想来代替党的文艺方针，但是，党接受与否完全在于党中央，胡风既然能够提意见我们应该欢迎，即使错误的也应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不应当对提意见者一棍子打死，追查提意见者的动机、愿望、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带上反革命的帽子，应当与胡风的文艺思想在民主基础上展开争鸣，让真理最后胜利。

党中央在胡风问题上是否表现了宗派主义，压制民主？集思想为一个脑袋是大有商榷的。

5. 事实上党在文坛上的领导并不绝对正确、完美无缺。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严重的存在着，在“人民文学”对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人”（应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编者）及“文艺报”对李希凡、蓝翎评击俞平伯红楼梦问题的处理上充分表现了出来。

6. 从胡风的信件上判定胡风是反革命是很难令人信服的。那些公布的信件是否片面的理解胡风？



胡风说的某些咒骂的话句如“图腾”、“敬神”、“市侩”、“马挂”、“董事会”是否是胡风对文坛上长期存在着的歪风一种强烈的不满，因无能为力而大发牢骚；或者因为当时自己的理论受压制（如象胡风论文坛被机械论所控制）。

7. 胡风反革命在法律上找不到任何根据。胡风在解放前曾和国民党特务陈焯很要好，胡风集团中的某些骨干分子如阿垅曾是国民党军官，吕荧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究竟以此推而广之，说胡风一定是反革命是缺乏说服力的。胡风在日本干了些不可告人的勾当，究竟是什么勾当？并不知道。胡风和蒋介石集团并没有直接连系，海外的蒋贼对胡风的赞美和祭悼是蒋介石集团的事，并不能成为说明胡风反革命的强有力论据。

8. ……胡风的“挖心战”、“集束手榴弹”、“橡皮钢丝鞭”……作为他自己这个学派战略战术是并不怎么坏的，对于敌对的理论应该是残酷无情的（就象阵地上的敌对双方一样），以使他这个学派在论战中不致陷于被动挨打地位，而刺探点情报是不能够说是反革命的，致于联络人、争取人，扩大自己学派的阵地、信函上用代号是合法的，是不能以此作为胡风是反革命的理由。

……

最后我想声明：我并不是“胡风不是反革命”的辩护者，对于胡风的“大作”，我并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我手中关于胡风问题的材料也并不多，时间有限，胡风究竟是反革命还是毒草的问题，目前我还不能得出结论。但是我有充分的理由要求政府公开审判胡风，彻底弄清真相，冒死为胡风请命！

——原载重庆建工学院鸣放快报 18 期

## 李登泚

西南俄文专科学校学生。

日本、国民党之所以被打垮，就是因为它落后，反动，并不是因为它不凶；难道谁能说当时的日本也不凶吗？再说，落后、反动又不是什么东西独有的，所以共产党如果落后，反动，到一定的程度，一定也要被打垮的。看来今天共产党在避免这个打垮。……共产党在落后了或者在反动了，但是还要不要呢？趁这一霎时间我自己选择回答道：要。因为共产党也是中国人，因为它自己在变落后为先进，反动为“顺动”；因为比它先进些的还没出现。相关联的，什么主义要不要，也要看它具体给人们的是些什么。好些的没有出现，造反又何苦呢？造反不但要死人，而且造反后没死的也一定要挨冻受饿哩！

——《招魂篇》，原载学习快报 17 期

## 李振

西南俄文专科学校学生，共青团员。

共产党虽然经常叫要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我认为那只是用来解决干部闹情绪的方法之一。而共产党本身是不喜欢人家批评它的，不然过去我提了意见为什么要挨整呢？在机关提意见要挨整，到学校来提意见还要挨整，难道这是个别现象么？像人民代表的视察多是视察一些重点地区。金字招牌。共产党用许多干部和钱培养出来的典型区，而人民之疾苦他们是看不到的。虽然领导在接见外宾时说要求他们到处参观提供意见。然而他们能参观到的不过是钢都、北泉，而我们俄专离北泉仅几步之隔，而且又是座落在优美的松林坡上，前有静静的嘉陵江，后有雄伟的缙云山，却不敢让苏联代表团参观。当然无外是这个学校太不像话，使外人看了未免有失我大国之尊严，这就是假的表现，是不诚心的表现。是不喜欢听批评的表现。共产党过去不喜欢人家批评，今天却突然来个大转变，不能不使人对其诚意有所怀疑。再者这次提意见也是只包括中下级党组织和负责干部。为什么没人给毛主席和周总理提意见呢？如果说他们没缺点那恐怕是有些个人崇拜吧。……共产党应接受以前的教训，千万勿脱离群众。苏联和匈牙利所发生的事件都说明了过去给人民的民主不够。在中国虽然仅是风乍起，吹绿一池春水，可也说明人民内部是有矛盾的，这次揭发出来的事实也说明了中国内部的矛盾也不少，也不是一日一时造成的。为什么共产党过去不多给人民点民主，让人们畅所欲言而致如今有些问题解决起来被动呢？我想这是与共产党好大喜功，只爱听人奉承，不能听人忠言造成的。过去为什么不让人

说内部有矛盾呢？为什么对错误要掩掩盖盖呢？历史是最能教训人的，当然也能教训共产党。那就是任何一个阶级一个政党都只有在和人民紧密联系，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时，才有资格作人民的领袖，失掉与人民的联系，人民不会因你过去有功劳就原谅你，也就是毛主席说的99岁没犯错误，到100岁时犯错误人民还是要批评你。如果共产党不彻底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不教育自己的党员真正作到“吃苦在先，享乐在后”的话，久而久之，失去人民的信任，那人民要遗弃你，反对你，要杀你，也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李自成进北京和出北京时人民的看法就应引起共产党员的警惕，要彻底检查下有没有坐了北京就象李自成一样的作风。

——原载俄专“学习快报”十四期

## 王基敏

女，西南俄文专科学校学生。

县委书记是一县的天爷，人委会是傀儡，共产党包办一切，由于共产党这一恶劣作风，使得县长在群众中没有威信。县委书记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统购统销急躁冒进，出了不少问题，造成人命……我工作的地方，缺粮户多，却偏要喊“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生拉活扯成立合作社，这不能不引起人民反感。

部队对干部的婚姻张口就照顾，简直是把女人当商品。实际上买卖婚姻，表面上宣传婚姻法，实际上只有共产党的婚姻法，解放后败坏社会道德的都是党员、老干部，把祖宗传下来的美德都败坏了。女同志没有真正解放，年青的女人一到部队，首先接触到的就是老干部的追，不答应就是受气，不提拔。

一般干部的档案材料，档案内，组织上谈的甚么，应该本人知道。处理情况，也应该通知本人，任何申诉书都应该放在档案材料内，我不相信它，我不知道档案内给我下了什么结论。建议今后档案公开，由群众来判定。自己有怀疑的，应当要查明，提出自己的意见。

——原载“捍卫报”一、二期

## 蒋鸿图

西南俄文专科学校学生。

党应该对全国人民来一次“忠诚老实运动”

党要取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必须对人民要忠实，只是要人民对党忠诚老实，但党对人民不忠诚老实，“走群众路线”只是一句空话。过去报纸上说铁托是“帝国主义间谍”，现在改称为同志。过去是说对了还是错了？如果说现在叫“铁托同志”是叫对了，那么过去便是对同志进行了诬蔑，是对人民说了假话。去年猪肉紧张的主要原因是前年统购统销的偏差。农民自己吃的都不够。当然不能养猪。另一个原因是出口太多了。但是报纸上宣传只谈是购买力提高了，对真正的主要原因却瞒住不说。

为什么有些人怕民主？

有些领导人一提到民主、自由就像害怕火一样，现在说这些话总好像有资产阶级民主的嫌疑。他们把社会主义也有民主这件事忘了。有些人口口声声说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是一碰到真正要人民来当家作主，那就对不起，忘记了。选举人民代表、学生会都是事先圈定好了的，只是把群众叫来画个圈。还要张灯结彩，登报照相，表面上做得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骨子里真是天晓得！所谓选举，拆穿了说就是少数人导演一幕滑稽戏，把人民当成活宝，让他们在这幕剧里扮演一个可笑的角色。不民主的道理在哪里？广东省长陶铸说了一句实话。他说，全省的工矿如果让工人来选举厂长，现任的厂长将有一大半选不上。其实何止一大半，要真正发扬了民主，应该是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选不上。

——原载俄专学习快报十七期

## 舒仁和

重庆师范专科学校语文科学生。

今天的大学没有解放前的大学办得好，解放前的大学，学术研究空气很浓厚，出现了一些有名的科学家和学者，而且学生的思想也很活跃。今天的大学没有出现甚么科学家、学者，这主要是受了党、

团的思想教育的压抑。

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胡风所谓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也就是今天文艺界需要反对的清规戒律。现在虽然有人反对他，但百年之后，人们就会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

现在的国产片多是公式化概念化，主要的是政治主题，没有一点人情味，其艺术价值不但比不上“五四”以来的进步片，连香港片也比不上。你看观众对国产片就不热心，其原因就是文艺界的清规戒律太多了，作家只能服从指示，不能写出自己所想的。

——学校综合整理言论■